

#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1900-1945） 的臺灣學生\*

許雪姬\*\*

## 摘 要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為日本東亞同文會在 1900 年創立於南京（同年遷到上海），以培養「支那通」為目的的學校，設校經費來自日本政府的巨額補助。1945 年 8 月隨著日本戰敗，於 9 月閉校。在這 45 年間一共有 4,368 人受教，為日本培養一些學界、外交界、新聞界、實業界的人才，但對中國而言這些人卻是侵華的先鋒。這所學校有 30 名臺灣學生，其中有 3 人以閩、粵籍生的身分，於 1920 年進入該院所設的中華學生部。有關本校的臺灣學生，已經有學者做初步研究，但因使用的資料不足，而有再研究的空間。本文利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有關的檔案、外國旅券下付表，以及大學史、同窓會名簿，先探討東亞同文書院大學設立的始末，次則探討臺灣學生何以前往該校就讀；30 位畢、肄業生的經歷，以了解其學緣以及戰後的業緣；再者就 3 名事蹟特別的學生做深入的研究，即臺中人、廣東副領事陳新座，苗栗人、軍統南京組副組長彭盛木，鹿港人、上海外國語大學日語教授王宏，同校畢、肄業，卻發展出不同的認同，可見臺灣人心性複雜之一斑。近年來日本早稻田大學、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臺灣人畢業生都已有了研究成果，研究東亞同文書院大學踵繼其後，不僅是研究海外臺灣人的又一章，也是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

關鍵詞：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陳新座、彭盛木、王宏

---

\* 本文能完成，感謝收藏家郭双富先生提供《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1982）、《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0、1987、1998）等書供參考。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來稿日期：2018 年 3 月 6 日；通過刊登：2018 年 5 月 4 日。

- 一、前言
- 二、檔案資料與過去的研究
- 三、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設立與終結
- 四、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臺灣學生
- 五、不一樣的認同：以陳新座、彭盛木、王宏為例
- 六、結論

---

## 一、前言

東亞同文書院為日本東亞同文會於1900年設立的學校，1945年9月20日閉校，<sup>1</sup> 前後有46期畢、肄業生，共4,368人。<sup>2</sup> 由於學校設在中國，雖學生中以日本人為多，但也有中國人入學。<sup>3</sup> 1895年臺灣被清朝割讓給日本，1910年朝鮮被日本併合，兩者成為日本帝國中有所別於內地的外地，因而也有由外地前往就讀者。到底有多少臺灣人在東亞同文書院就讀？由1930年出版的《創立三十週年紀念：東亞同文書院誌》一書中，「日本畢業生地方別」中所載，臺北有16人，臺灣各地則有6人。<sup>4</sup> 就目前所知最早的臺灣人畢業生，為1919年第16期畢業的林伯灶／奏。<sup>5</sup> 究竟自第16-46期間有多少臺灣人畢、肄業生？這是本文

---

<sup>1</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東京：該會，1955，以下稱《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頁84-85。

<sup>2</sup> 4,368人中，東亞同文書院畢業的有3,198人，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包括42期由預科入學者）1,021人，專門部（1944年開始招收）419人。參見〈東亞同文書院、同大學同專門部卒業者數統計表〉，收於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頁337。本文敘述時大半用東亞同文書院，後期則用東亞同文書院大學，有時簡稱同文書院。

<sup>3</sup> 〈索引〉，收於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東京：該會，1998），頁52。分中國，臺灣，韓國·朝鮮。

<sup>4</sup>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編，《創立三十週年紀念：東亞同文書院誌》（上海：該院，1930），頁114。這其中包括在臺灣的日本人。

<sup>5</sup> 〈第十六期生〉（1916年8月27日入學，1919年6月29日畢業），收於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頁312。原名林伯「灶」，後改為「奏」，兩字臺語音同。

必須要確定的，其次是他們何以選擇這所學校？畢、肄業後的動向如何？而東亞同文書院／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究竟是一所什麼性質的學校，也有必要究明。

近年來日本學界對於戰前在日本各大學進修的中國、朝鮮、滿洲國、臺灣的留學生相當關心，2013年愛知大學東亞同文書院大學記念センター研究員武井義和撰寫〈東亜同文書院で学んだ台湾人学生について〉一文，以在該校就讀的臺灣學生為主，針對性很強，卻因故將畢業生的名字（除了極少數有姓外）用英文字母來代替，不僅如此，在畢業後的就職單位也都刪除，提供的資訊有限。<sup>6</sup> 2015年陸續有《留学生の早稲田：近代日本の知の接触領域》、<sup>7</sup> 《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学校とアジアの留学生》、<sup>8</sup> 《滿洲国留日学生の日中關係史：滿洲事変・中日戦争から戦後民間外交へ》，<sup>9</sup> 上述三本著作，在研究學校史、重視畢業生的生涯等方面，可供學習之處頗多。

我過去以研究海外臺灣人為主，也已發表過日本人在滿洲設立建國大學和大同學院中的臺灣學生，<sup>10</sup> 故累積了一些資料、經驗，可以運用在研究東亞同文書院的臺灣學生上。

挑選研究此題目的另一個原因是被畢業於同文書院的彭阿／盛木個人事蹟所吸引，其後半生在汪政權任職，卻加入軍統替重慶政府工作，又早在吳濁流的《臺灣連翹：臺灣的歷史見證》一書，已讀到彭盛木的相關事蹟；<sup>11</sup> 戴國輝談吳

<sup>6</sup> 武井義和，〈東亜同文書院で学んだ台湾人学生について〉，收於馬場毅、許雪姬、謝國興、黃英哲編，《近代台湾の經濟社会の変遷：日本とのかかわりをめぐって》（東京：東方書店，2013），頁31-48。

<sup>7</sup> 紀旭峰，〈戦前期早稲田大学のアジア人留学生の軌跡：中国人と台湾人留学生数の動向を中心に〉，收於李成市、劉傑編著，《留学生の早稲田：近代日本の知の接触領域》（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15），頁34-65。其中頁59有〈表5 戦前期早稲田大学台湾人卒業生一覽〉，值得參考。

<sup>8</sup> 奈良女子大学アジア・ジェンダー文化学研究センター編，《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学校とアジアの留学生》（奈良：該センター，2014）。2016年再由「敬文舎」出版。其中〈第四章 國・地域別留学生〉（頁249-252）中，舉出臺灣留學生共有5人，先後為莊無嫌（莊司雅子）、劉蘭、許春菊、周蓮姿、賴雪紅，劉、賴兩人中退。

<sup>9</sup> 浜口裕子，《滿洲国留日学生の日中關係史：滿洲事変・中日戦争から戦後民間外交へ》（東京：勁草書房，2015）。除前言、結論外，有11章加終章，談論滿洲國的對日留學政策和留學生在戰前、戰後如何對應整個中日關係，以及戰後擔任日中民間外交的角色。

<sup>10</sup> 許雪姬，〈滿洲經驗與白色恐怖：「滿洲建大等案」的實與虛〉，收於許雪姬主編，《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記錄》（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3），頁1-39；許雪姬，〈在「滿洲國」的臺灣人高等官：以大同學院的畢業生為例〉，《臺灣史研究》（臺北）19:3（2012年9月），頁95-150。

<sup>11</sup> 吳濁流著、鍾肇政譯，《臺灣連翹：臺灣的歷史見證》（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87-88。

濁流的世界時，提到在中國南京、上海因間諜嫌疑而被殺的彭盛木，是同文書院中唯一的教授。<sup>12</sup> 再閱讀劉傑《漢奸裁判：対日協力者を襲った運命》一書中得到進一步的訊息；<sup>13</sup> 又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三）：臺灣高等法院檔案》一書中看到其妹彭淑真，稱其兄「任職中央，為擔負特務工作。」<sup>14</sup> 而得到證實。彭阿木正是東亞同文書院的畢業生、教師，話題十足，<sup>15</sup> 可以在本研究進行更完整的呈現。2017年我發表〈東亜同文書院中の台湾籍学生と林如堉、吳逸民兩人の白色テロ体験〉一文，旨在說明戰後臺灣學生的下落，特別是林、吳兩人在戰後戒嚴時期被處決、判刑的經過。<sup>16</sup> 然而還有如陳新座、簡崑田、王康緒等更多有意義的人物的事蹟尚待發掘、補充、訂正。

研究此主題，除了無法參閱日本愛知大學所藏的東亞同文書院「學籍簿」<sup>17</sup> 令人遺憾外，由於該校雖由「興亞團體」的東亞同文會，以保全中國，日、中同盟，為國培育人才為理念而設，<sup>18</sup> 但畢竟培養出來的一些畢業生，以其流暢的中文能力從事情報工作，或成為侵略中國的先兵，因而到目前為止有些出自該校的學生（尤其在中國的臺灣人學生），尚不敢將這段經歷公開說明。<sup>19</sup> 為了積極進行相關研究，口訪畢、肄業生乃為當務之急，然而除了大半學生已經亡故無法訪談外，即使找到其後代，也面臨取得資料後，不允使用的境地。<sup>20</sup> 這就無怪乎武井義和

<sup>12</sup> 戴國輝，〈二 吳濁流の世界〉，收於戴國輝，《台湾と台湾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求めて》（東京：研文出版，1985），頁272。

<sup>13</sup> 劉傑，《漢奸裁判：対日協力者を襲った運命》（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0），頁219-221。

<sup>14</sup> 周琇環、歐素瑛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三）：臺灣高等法院檔案》（臺北：國史館，2002），頁93-94。

<sup>15</sup> 滬友會，《東亜同文書院大学同窓会名簿》（東京：該會，1980），頁53。我曾撰文簡單介紹此事，見許雪姬著、杉本史子譯，〈日本統治における台湾人の中国での活動：満洲国と汪精衛政権にいた人々を例として〉，《中国21》（東京）36（2012年3月），頁104-105。

<sup>16</sup> 許雪姬著、朝田紀子譯，〈東亜同文書院中の台湾籍学生と林如堉、吳逸民兩人戦後の白色テロ体験〉，收於馬場毅編集，《近代日中關係史の中のアジア主義：東亜同文會・東亜同文書院を中心に》（名古屋：あるむ，2017），頁113-132。

<sup>17</sup> 由於要看「學籍簿」，必須取得其本人或其後人的同意書，因此無法讀取，但本文儘可能克服此一困難。

<sup>18</sup> 馬場毅，〈序説〉，收於馬場毅編集，《近代日中關係史の中のアジア主義：東亜同文會・東亜同文書院を中心に》，頁8-9。

<sup>19</sup> 陳弘，〈半世紀的死別與重聚〉，收於鐘明宏，《一九四六・被遺忘的臺籍青年》（臺北：沐風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4），頁97。陳弘（陳伯熙），第44期（大學部第5期）。在他的受訪紀錄中，說他在基隆中學因故停學後，在1942年為了繼續升學，只好遠渡重洋到東京唸書，日本投降後他返回臺灣，中間缺了1944年進入上海東亜同文書院大學的預科就讀之紀錄。

<sup>20</sup> 本人得到郭双富先生的協助，找到日治時期唯一任職日本外務部的畢業生之後代，已經整編口述歷史、採集資料完成，但其後人突然不同意公布，誠令人遺憾。

不「敢」將臺灣學生的名字「露出」。終戰迄今已七十多年，住在臺灣這塊土地的人，尚為其長輩於日治時期的事蹟，是否冒犯了「國家」而擔憂，令人感慨萬千。

## 二、檔案資料與過去的研究

### （一）檔案資料

研究東亞同文書院的臺灣學生最重要的資料，自然是日本敗戰後於 1946 年由廢校後的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教師、學生，優先帶回日本，而迄今保存設立在愛知大學（1946 年成立）內的「愛知大學東亞同文書院大學記念センター」（1993 年設立在豐橋市町畑町）的「學籍簿」與「成績簿」，據說日本在外地設立的學校中，能帶回重要資料者，僅此一例。<sup>21</sup> 由於特別珍貴，因此除非該中心的研究員或愛知大學的教師、學生自行研究，<sup>22</sup> 否則要看上述資料，需本人或其後人的同意書才能閱讀。既然無法參考這批資料，必須取得另一種珍貴的史料，即畢業於東亞同文書院者所組織的滬友會所編輯、出版的《會員名簿》（1940），《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東亞同文書院大学同窓会名簿》，尤其是 1998 年的版本將中國、臺灣、朝鮮學生的名單羅列，雖不免有些小錯誤，卻是重要的資料來源。此外東亞同文書院出版的《創立三十週年記念：東亞同文書院誌》、東亞同文書院大学史編纂委員會於 1982 年出版《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創立八十週年記念誌》，後者搜集畢、肄業生的現況，對本研究助益甚多。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東亞同文書院關係雜件》，<sup>23</sup> 包括人事、收支預算相抵關係表大學設立關係、大學設立關係、紛議及治安維持法違反關係、畢業生及其成績關係、年報關係，雖然不全，但其中有珍貴的部分學生資料、成績單。

<sup>21</sup> 愛知大学東亞同文書院大学記念センター編集，《愛知大学創成期の群像：寫真集》（名古屋：該センター，2014），頁 26。

<sup>22</sup> 如室井雅宏，〈朝鮮總督府教育政策：東亞同文書院大学の學籍簿調査から〉（名古屋：愛知大学大学院中国研究科修士論文，2005）。轉引自武井義和，〈東亞同文書院で学んだ台湾人学生について〉一文。這兩篇論文即其一例。

<sup>23</sup> 總共有 14 卷《東亞同文書院關係雜件》（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號：H-4-3-0-2。此外還有 2 卷《東亞学校關係雜件》（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號：H-4-3-0-8；《東亞同文書院關係一件》（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號：I-1-5-0-11。

上海華東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陳祖恩《上海日僑社會生活史(1868-1945)》一書，記載落腳在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sup>24</sup>〈臺灣總督府外國旅券下付表〉(1897-1942年)中，找到部分該院畢、肄業生的旅券資料，如彭阿木(包括其妻彭李桃妹)、葉金朗、李玉田的生年，及其等到上海的旅券下付表。至於個別畢業生的資料，《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有陳新座的相關消息。2011年我在上海徐家匯圖書館找到臺灣畫家吳茂仁編輯的《在華中臺灣同胞寫真年鑑·附商工名人錄》，是在汪政權下旅居上海臺灣人最重要的資料，其中有林伯奏的傳。<sup>25</sup>在上海市檔案館找到戰後臺灣人的團體「新臺灣同志會」，有6位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學生一起加入的個資。<sup>26</sup>《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一)》有簡崑田的資料，<sup>27</sup>中國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陳杏村(臺灣臺南)戰犯案》中有關於其子謝哲義的資料。<sup>28</sup>其他相關資料可在人士鑑、人物傳中取得，另外也用到一些方志和口述歷史。2015年3月我在上海訪問學部第44期(大學部第5期)學生王康緒(後改名王宏)；<sup>29</sup>以及同年9月出版的吳逸民口述史，<sup>30</sup>上述都是研究臺灣學生最直接的史料。

## (二) 過去的研究成果

研究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畢、肄業學生，自然以「承繼」的愛知大學為中心，連研究該書院的臺灣學生，也以在該校東亞同文書院大学記念センター的武井義和提出之論文最早、最仔細，其利器就是愛知大學的「學籍簿」。文中指出進入同文書院的臺籍學生以私費生占多數，有異於由日本或清國由地方政府支付學費

<sup>24</sup> 陳祖恩，《上海日僑社會生活史(1868-1945)》(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頁446-467。

<sup>25</sup> 吳茂仁編輯，《在華中臺灣同胞寫真年鑑·附商工名人錄》(上海：吳茂仁，1943)，頁115-116。吳茂仁為宜蘭出身的畫家。

<sup>26</sup> 〈新臺灣同志會入會申請書〉，「社、團、會全宗彙集」(上海：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號：Q130\_63\_(1)、(3)。即林伯奏、林仲秋父子、陳萬增、劉改造、陳伯熙、謝哲義。

<sup>27</sup> 〈件名二：董貫志呈報簡崑田、李淇參與暴動情形〉(民國36年3月15日)，收於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頁212-214。

<sup>28</sup> 謝哲義，〈為生母被訴戰犯案件具呈辯訴懇乞省事以恤無辜事〉，《陳杏村(臺灣臺南)戰犯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179，案卷號：1023。

<sup>29</sup> 許雪姬訪問、記錄，〈王宏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2015年3月7日，於中國上海安亭別墅花園酒店。

<sup>30</sup> 吳逸民口述、薛化元採訪，〈喚不回的青春〉，收於周佩蓉等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輯三：喚不回的青春》(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132-158。

的公費生。由於該院學費相當貴，因此 1916-1924 年入學的 5 名臺灣學生，大半出身富豪子弟；而其出身的學校分別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臺中中學校（共 3 人，1923 年後改為臺中第一中學校）、東京私立中學校。自 1923 年後出身的學校則呈現多樣化，有臺北第一中學、高雄中學、臺中第二中學、基隆中學、臺南第一中學，還有 3 名出身商業學校，有就讀上海居留民團立日本商業學校；或出身日本中學校。其次討論畢業後的職業與日本戰敗後的人生，他又將之分為 1945 年以前與以後，武井分析 1945 年以前畢業的學生有回臺灣者，有留在上海者，也有在中國各地就職這三個模式。大部分人都活躍於「商工業、會社」，也有留在母校任教的，更有任職副領事的臺灣人，他特別介紹「彭」和「陳」兩人。至於 1945 年以後這些畢、肄業生之進路，仍是以在商界為多，也有人進入教育界，其中有兩位留在中國，他們的消息要到 1972 年日本和中國復交後才能得知；回到臺灣的畢業生亦在 1953 年「中日和約」簽訂後，在臺灣設東亞同文書院同窓會臺北支部，才使戰後臺灣學生的活動明朗化。<sup>31</sup> 既然已有此文，何以我還要再研究？

武井此開創之作，有兩個表，一是「表 1 台湾人学生の派遣元、入学前の学歴」、二是「表 2 台湾人学生の卒業後の進路（戦前より 1980 年代まで）」，之所以做到 1980 年代，乃參考 1982 年《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所致。表 1 有 21 人、表 2 有 19 人（其中彭、C 已逝）。其中除「彭」、「陳」外，其姓名全用英文字母替代，甚至連就職的會社名也全都隱去，只看到這 21 人模糊的團體像，無法一一了解。其次，本文不及於 1945 年 4 月入學的學生，因此有所不足。在表 1、表 2 中的「K」除了中學的畢業校外，表格中一片空白，<sup>32</sup> 究竟「K」是誰有必要研究。為了先解決「K」是誰的問題？我在〈東亞同文書院中の台湾籍学生と林如堉、吳逸民兩人戦後の白色テロ体験〉一文中，利用當時所取得的國家檔案局相關資料，<sup>33</sup> 大致介紹臺灣人的畢業生，並利用同窓會名簿找到名字，

<sup>31</sup> 武井義和，〈東亞同文書院で学んだ台湾人学生について〉，頁 43。武井之文轉引自 1953 年的《滬友名簿》，頁 48。

<sup>32</sup> 武井義和，〈東亞同文書院で学んだ台湾人学生について〉，頁 31-48。參見頁 34 表 1、頁 41 表 2。

<sup>33</sup> 〈林如堉個人資料〉（國家檔案局受難者個人資料）（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案號：49090。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代呈）〈檢呈吳朝麒等匪諜案更正判決及執行照片請察核由〉，受文者為國防部參謀總長周[至柔]。中華民國四十年一月拾日。由「檔應字第 1020012774 號」函提供。

做初步的介紹，並特別指出「K」就是已在1950年12月16日被行刑於馬場町的林如堉。另一個是吳逸民，他在白色恐怖時期被判刑10年，再加感化教育3年（感訓時間是1年10個月又9天）。<sup>34</sup> 此文雖解決了一些武井論文留下的問題，但也不免產生一些錯誤，如文中出現的許斌華、張信明，並非臺灣學生；<sup>35</sup> 再者，武井文中對陳新座等人在戰後的情形未曾說明、或說明太過簡略，有必要進一步說明，爰有此文之作。

至於研究東亞同文會與東亞同文書院的關係者，在日本實繁有徒，不另介紹，在臺灣對東亞同文書院進行相關研究者首推黃福慶，他在研究東亞同文會時，特別重視其在中國的教育事業（設立東亞同文書院），<sup>36</sup> 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 三、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設立與終結

臺灣學生在島內受到差別待遇，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有限，因此前往日本、中國就讀者不少。到日本，受到的差別待遇相對少，但學費高；至於到中國，則學校多、學費便宜，若以華僑身分入學，有時還能減免，甚至免除學費，對討厭日本統治、有漢人認同者而言，更是有意義的選擇；但若遇到排日、抗日的情形，則會受池魚之殃。因此選擇日本在中國、朝鮮設立的學校就讀，亦不失為折衷的辦法。<sup>37</sup>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是一所什麼樣的學校？而臺灣學生何以選擇這個學校就讀？

#### （一）東亞同文書院設立始末

##### 1. 沿革

東亞同文書院設立於1900年，是東亞同文會所經營最重要的事業。該會是

<sup>34</sup> 許雪姬著、朝田紀子譯，〈東亞同文書院中的台灣籍學生と林如堉、吳逸民兩人戰後の白色テロ体験〉，頁127-131。

<sup>35</sup> 許雪姬著、朝田紀子譯，〈東亞同文書院中的台灣籍學生と林如堉、吳逸民兩人戰後の白色テロ体験〉，頁122。

<sup>36</sup> 黃福慶，〈東亞同文會：日本在華文教活動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5（1976年6月），頁337-368。

<sup>37</sup> 許雪姬著、杉本史子譯，〈日本統治における台湾人の中国での活動：満洲国と汪精衛政権にいた人々を例として〉，頁99。



日本甲午戰爭後的 1898 年所成立之國家主義團體，<sup>38</sup> 其背景乃因甲午戰爭對中日兩國關係而言，起了劃時代的改變；而列強意欲瓜分中國領土的企圖，特別在之後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中突顯出來，況且在福澤諭吉等人提倡日本應脫亞入歐後，日本的注意力乃由東轉而向西。然而亞洲主義者近衛篤磨<sup>39</sup> 憂心東亞的未來，希望能促成東亞大團結，故在 1898 年 7 月設立同文會，之後與犬養健等的東亞會合併，11 月創立東亞同文會。該會的主要綱領有四：1、保全中國；2、助成中國、朝鮮改善；3、期能實行對中國及朝鮮的時事進行研究；4、喚起全日本的輿論，<sup>40</sup> 而設立同文書院就是要教育中國人和朝鮮人，同時要養成日本人的「支那通」。為了達成上述目的，乃在中國、朝鮮等地設學校。1900 年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應許下，在南京妙相庵校舍設同文書院，本院培養日本學生、分院教育中國學生。學生的來源由日本、清國各府縣以公費方式派遣該府縣優秀子弟到南京就讀，日本學生學中國語文，兼學政治經濟；中國學生則學日語，兼讀科學思想。<sup>41</sup> 東亞同文會號稱民間團體，但設校的經費來自日本政府的巨額支助，<sup>42</sup> 因此設校目的並不單純。

然而書院設立後，旋即於 7 月發生庚子義和團事件，南京有受波及之虞，該書院在兩江總督劉坤一建議下，日本學生暫遷到上海（退省路暫時校舍）繼續上課，分院則於 8 月關閉。事件結束後，該書院認為上海是清朝商業的總匯，更是社會、政治、外交上的中心，對於中、外語的研習，調查清國的情況，都能得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決定本院改設在上海，分院則遷到東京目白，稱東京同文書院，專門招收中國留學生。<sup>43</sup> 1901 年 5 月 26 日，東亞同文書院在上海高昌廟桂

<sup>38</sup> 日本近現代史辭典編纂委員會編，《日本近現代史辭典》（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78），頁 449。

<sup>39</sup> 近衛篤磨（1863-1904），明治時代後期的政治家，1884 年為公爵，1885-1890 年在德奧留學，回日本後擔任貴族院議員，1895 年起任學習院長直到過世。以甲午戰爭為分水嶺，他鑒於西方列強要瓜分中國，為了保全中國，於 1898 年成立同文會，接著和犬養健等人參加的「東亞會」聯合，組織東亞同文會，擔任會長，此會在財政上依賴日本外務省供給的機密費。參見白井勝美、高村直助、鳥海靖、由井正臣編，《日本近現代人名辭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頁 427。

<sup>40</sup>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編，《創立三十週年記念：東亞同文書院誌》，頁 19。

<sup>41</sup>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編，《創立三十週年記念：東亞同文書院誌》，頁 25-29。同時在東京設立同文書院，參見馬場毅，《東京同文書院について》，收於馬場毅、許雪姬、謝國興、黃英哲編，《近代台湾の經濟社會の變遷：日本とのかかわりをめぐって》，頁 3-29。

<sup>42</sup> 陳祖恩，《上海日僑社會生活史（1868-1945）》，頁 448。

<sup>43</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頁 23、25。

墅里校舍舉行開院式，由曾任日清貿易研究所代理所長的根津一擔任院長。<sup>44</sup>

1913年二次革命反對袁世凱帝制的戰爭爆發，南北二軍為了爭奪江南製造局開戰，使位在鄰近的東亞同文書院被炮火波及，學校建築大半被焚，第13期生先在日本肥前國大村町的暫時校舍上課，<sup>45</sup>而在上海的學生則先暫借虹口赫司克而路校舍上課，當時的學習環境不佳。<sup>46</sup>直到11月上海赫司克而路的暫時校舍建成，第13期生才來到上海。<sup>47</sup>1915年開始建新校舍（建地24,810坪，其中運動場10,000坪、建築物共3,837坪），位在徐匯虹橋路100號，當時算是上海郊外，周邊還都是農田。1917年4月落成後，乃遷到此地。<sup>48</sup>

1932年上海事件爆發，做為培養中國通的外國學校受到攻擊，受僱的中國人也都離去，住在院內的師生，連飲食都有困難，故所有學生於2月轉到日本長崎高等商業學校上課，4月因戰事平定再回到上海。<sup>49</sup>1937年中日第二次戰爭爆發，該院師生於10月遷回長崎，11月東亞同文書院被燒燬。12月上海遭日軍占領後，該書院乃向日本外務省及陸軍當局商借交通大學為校舍，因此1938年以後的同文書院乃進入海格路臨時校舍時代。<sup>50</sup>到1945年4月，雖已招募了該年度的新生，但部分在日本的學生無法到上海就讀，7月乃改至富山縣吳羽的航空機株式會社暫住，稱吳羽分校，以學習中文為主。<sup>51</sup>8月日本敗戰後，9月國民政府接收該院在海格路的借用校址。鑒於東亞同文會已無法再在中國發展事業，乃決定解散，東亞同文書院大學乃在1946年1-4月間遷回日本，如何復校以收

<sup>44</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頁74。根津一自1900年5月東亞同文書院開設，迄1927年5月任院長。根津一（1866-1927），山梨縣人。1883年陸軍士官學校畢業，1885年進入陸軍大學校，1887年進入參謀本部，翌年轉入預備役而代理荒尾精在上海成立的日清貿易研究所任所長，並全力編著《清國商業總覽》，1892年出版。甲午戰爭時，復歸參謀本部，1900年南京同文書院成立，受東亞同文會會長近衛篤磨的邀請擔任院長，同年也成為東亞同文會幹事長，成為東亞同文會及同文書院經營的中心人物。參見白井勝美、高村直助、島海靖、由井正臣編，《日本近現代人名辭典》，頁800。

<sup>45</sup>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編，《創立三十週年記念：東亞同文書院誌》，頁45。

<sup>46</sup> 陳祖恩，《上海日僑社會生活史（1868-1945）》，頁455。

<sup>47</sup>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編，《創立三十週年記念：東亞同文書院誌》，頁45。

<sup>48</sup>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編，《創立三十週年記念：東亞同文書院誌》，頁49、65；陳祖恩，《上海日僑社會生活史（1868-1945）》，頁456。

<sup>49</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頁63。

<sup>50</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頁70。

<sup>51</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頁84。吳羽分校也在11月關閉。參見馬場毅，〈序說〉，頁15。

容尚未畢業的學生乃為當務之急。然而創辦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東亞同文會既已解散，而 GHQ 也不允許再復校，於是由繼承東亞同文會財產的財團法人霞山俱樂部於 1946 年 11 月創立有別於原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愛知大學，收容以該書院大學為中心，以及其他設在日本之外的日本教育機關之師生。<sup>52</sup>

## 2. 學制與教育內容

東亞同文書院一開始為三年制，招考中學畢業生（四、五年制），設有政治科與商務科，政治科的科目為：倫理、支那語、英語、時文、漢文、漢文尺牘、歐洲近世外交史、法學通論、民法、商法、刑法、國際公法及私法、行政法、經濟學、財政學、支那政治地理、支那制度；商務科：倫理、支那語、英語、時文、漢文、漢文尺牘、法學通論、民法、商業學、商業算術、簿記學、商業實踐、商品學、支那商業地理、支那商業慣習、支那制度。<sup>53</sup> 為了因應上海土語的需要，1915 年 5 月起該院（設於北市虹口）開始教上海土話，每天下午 3-5 時分班授課。<sup>54</sup> 由上述科目就可知其培養「中國通」的一斑。1914 年為因應所需，又設農工科，第一部製造化學科、第二部採礦冶金科，都修業三年。<sup>55</sup>

1918 年第四十回帝國會議在東京召開，議決通過「有關中國人教育設施有關的建議案」、「日中文化設施有關的建議案」，於是外務省命令要為中國人的教育創設附屬實業學堂，在配合政策下東亞同文書院必須予以擴充。雖然該院也顧慮到，設立後是否會成為反日學生養成所？但為了配合政策，仍設立「中華學生部」，開始興建新校舍。<sup>56</sup> 在得到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同意下，東亞同文書院訂定

<sup>52</sup> 1945 年當時東亞同文會會長近衛文麿，被指名為戰犯嫌疑者，在 12 月服毒自盡；副會長阿部信行、理事長津田靜枝、常務理事一宮房治郎都被 GHQ 解除公職，故該會不得不解散。至於愛知大學的創立，乃是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校長本間喜一為中心及在其他原教職員努力下，也在豐田忍豐橋市長的認可下，11 月在豐橋設立，即今愛知大學豐橋校區。以上參考馬場毅，〈序說〉，頁 14-15；愛知大學東亞同文書院大學記念センター編集，《愛知大學創成期の群像：寫真集》，頁 25。

<sup>53</sup>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編，《創立三十週年記念：東亞同文書院誌》，頁 37-38。

<sup>54</sup> 〈同文書院添授上海土語〉，《申報》第 15186 期，1915 年 5 月 24 日，第 10 版。

<sup>55</sup>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編，《創立三十週年記念：東亞同文書院誌》，頁 48。

<sup>56</sup> 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創立八十周年記念誌》（東京：滬友會，1982，以下簡稱《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 176-177。協定內容有四，簡言之，該院每年可招收 50 名學生；入學資格以中學畢業生為限；先讀預科 1 年，本科 3 年與日本學生共學；入學生由中國各省相關機構選拔，並酌給公費。

協定<sup>57</sup>設立中華學生部，但一開始招收中國籍學生就遭遇相當困難的局面，此係1919年中日因山東問題引起排日風潮，再加上5月開始的五四運動，即使北洋政府的中央、地方之教育關係當局也幫不上忙，因此同文書院在情勢穩定後才於1920年招收了6名學生，9月校舍竣工。<sup>58</sup>

中華學生部設商務科（4年）、工業科（5年），招收中等學校畢業生，先入預科學習倫理、日本語、英語、日本概史、漢文、商業算術、簿記等科目，一年後進入本科和日本學生共學。學生來源由中國各地官廳、日本在華公館推荐，不經考試即可入學（1928年第10屆起則通過考試才得入學）。該部設立後迄1931年不再招生，1934年最後4名學生畢業後即走入歷史。前後14年大約有400人入學，但畢業生大概只在50名左右，<sup>59</sup>幾乎只有一年招生的數額，何以如此？主要是中日間政治、軍事問題頻發，日本在中國設立教育機關往往被視為侵略中國文化的基地；且上海是全中國最重要的城市，在該地的中國學生紛紛投入抗日的行列，東亞同文書院可謂首當其衝。該院不僅招生困難，且中國學生在上海抗日事件中無役不與，遂自動退學，或被學校退學或被政府機關逮捕所致。此外，中、日左翼學生聯合組織反戰組織「日支鬥爭同盟」，針對學校的經營表達不滿，進行罷課，要求教授辭職等，使情勢更是雪上加霜。<sup>60</sup>

先是1923年4月以後，收回旅大、廢除二十一條的抗日運動在全中國各地展開，東亞同文書院學生要中國籍教授草成「旅大回收宣言」，並在7日予以公布，學校方面以將邢震春等4位主謀開除收拾局面。1925年五卅運動，上海20萬人罷工，學生5萬人同步罷課，東亞同文書院學生跟進，返鄉、退學者增多。<sup>61</sup>後來東亞同文書院先後有多名學生加入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在校內成立黨支部，1933年3月2日早上，日本領事館警察進入院內，逮捕了19名學生，中共黨支部的活動乃告中止。<sup>62</sup>1934年4名中國學生畢業後，中華學生部正式告終。<sup>63</sup>

<sup>57</sup> 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176-177。

<sup>58</sup> 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176。

<sup>59</sup> 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177。

<sup>60</sup> 陳祖恩，《上海日僑生活史（1868-1945）》，頁463-464。

<sup>61</sup> 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178。

<sup>62</sup> 陳祖恩，《上海日僑生活史（1868-1945）》，頁464。有關此次的逮捕行動，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的《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一書中，無一字及之。

<sup>63</sup> 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182。

東亞同文書院在存在的 45 年中，還有兩次變動，一是 1921 年東亞同文書院學制由 3 年改為 4 年，成為商業專門學校。<sup>64</sup> 二是 1938 年申請設置大學，1939 年 4 月 1 日獲准設立，之後預科第一屆學生入學，預科 2 年，大學 3 年，商學部設研究科（2 年以上），12 月正式升格為「東亞同文書院大學」，但仍保留專門部。<sup>65</sup>

同文書院既然要培養中國通，1918 年設立了支那研究部，1939 年設立統計研究室。<sup>66</sup> 組織師生進行下列的研究與主要活動，陳祖恩提綱挈領地說明以下 6 項：1、收集有關中國研究的資料，特別是書與報刊雜誌，包括有研究價值的中國貨幣、商業文件、地券、傳單；2、組織團隊進行指定題目的調查旅行，此自 1920 年起，每年舉行，並發刊《支那研究》做為發表園地；3、每年派學生分組作研修調查大旅行，並給予指導，有時長達 200 多天，這些報告後來就編成《支那經濟全書》（12 輯）、《支那省別全志》（12 卷）；<sup>67</sup> 4、發行定期及不定期刊物，如上述的《支那研究》（1920 年 8 月起發行），其中也編成專號，另出版不定期刊物刊登一篇或數篇論文；5、舉行各種演講會，邀請校內、校外人士專題演講；6、拍攝有關中國內地風景、風俗、生活習慣等內容的資料電影，利用假期到日本各地放映，讓日本人了解中國實情。<sup>68</sup>

東亞同文會的成員固有如山田純三郎等人，支援孫中山革命，並任東亞同文書院的助教、教授，<sup>69</sup> 在孫中山臨終時，也是唯一在場的日本人，<sup>70</sup> 其勞績為中國方面所肯定。但同文書院培養中國通或了解日本的日本通，固然對中日兩國互相交流，有所推進；但培養日本通似乎並不成功，已如上述；雖然培養不少中國

<sup>64</sup> 陳祖恩，《上海日僑生活史（1868-1945）》，頁 462。

<sup>65</sup> 《東亞同文書院關係雜件／大學設立關係》，檔號：H-4-3-0-2-3。昭和 13 年 8 月 23 日後發、8 月 24 日著，由東亞同文書院院長大內暢三致字垣外務大臣、日高總領事。大學設置後，雖只設置商科，但未來朝向設醫科、農科、工科發展，成為一所綜合大學邁進。本檔案藏於日本。

<sup>66</sup> 此室以搜集、整理中國有關的統計資料為主。參見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頁 80。

<sup>67</sup> 1939 年後的大旅行改為第四學年生，分班（組）到南洋、越南、菲律賓等地進行。但越南組自河內進入中國雲南國境時被逮捕、監禁，此後在時局的因素下，乃到日本在各地的占領區做調查，直到 1945 年才中止。參見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頁 80-84。

<sup>68</sup> 陳祖恩，《上海日僑生活史（1868-1945）》，頁 459-462。

<sup>69</sup> 秦孝儀總編纂，《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頁 10，〈山田純三郎〉；中西利八編纂，金丸裕一監修、解說，《中國紳士錄》（東京：ゆまに書房，2007），頁 848。

<sup>70</sup> 陳祖恩，《上海日僑社會生活史（1868-1945）》，頁 466。

通人才，但中國通亦為侵略中國的隊伍，<sup>71</sup> 因此後世對同文書院的評價兩極。滬友會會長內藤熊喜，為東亞同文書院辯白。內藤說：世人往往認為東亞同文書院及其大學是日本對中國侵略的機關，這是很大的誤解。東亞同文會的目的，儼然是希求和平，講求日、韓、華協力，保全中國以求東亞之長治久安，而得到世界和平。<sup>72</sup> 無論戰時、戰後日本方面的看法均如此，但在民族主義的氛圍下，沒有中國人會同意上述看法。

既然同文書院培養出來的畢業生，難免被視為侵略中國的幫兇，臺灣學生何以要就讀這所學校？做為當時是日本籍，戰後變成中國籍的臺灣人，首先要了解到底有多少臺灣學生進入該校？其個人的人生為何？

## 四、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臺灣學生

### （一）臺灣學生何以就讀東亞同文書院？

東亞同文書院是日人設立的學校，臺灣人當時屬日本籍，因此就讀該校乃順理成章之事。上海，在二十世紀初就已是個令人嚮往的國際城市，日本昭和時代的小說家村松梢風（1889-1961），在1924年出版《魔都》一書來描寫其在1923年旅遊上海之各種體驗，而後就有人不斷用「魔都」來稱上海。<sup>73</sup> 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屏東人藍敏，也說上海像個「魔都」。<sup>74</sup> 臺灣學生此前已至上海的學校就讀，並組織上海臺灣青年會，<sup>75</sup> 這些學校有上海大學、<sup>76</sup> 大夏大學、<sup>77</sup> 上海

<sup>71</sup> 陳祖恩，《上海日僑社會生治史（1868-1945）》，頁466-467。

<sup>72</sup> 內藤熊喜，〈序〉，收於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2。

<sup>73</sup> 高興，《中國現代文人與上海文化場域（1927-1933）》（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頁65。

<sup>74</sup> 前往上海聖約翰大學就讀政治系的屏東里港人藍敏，在1938年8月與父親到上海旅遊時即「感覺上海是世界最奇妙的城市，人種多，貧富皆有，像個『魔都』」。參見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藍敏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44。

<sup>75</sup>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Ⅲ）》（東京：綠蔭書房，1986年復刻版），頁69-74。

<sup>76</sup> 蔡孝乾、莊泗川都曾就讀上海大學，前者讀政治學部，後者就讀中國文學部。參見許雪姬訪問、黃美滋紀錄，〈百年憶往：莊泗川先生訪談紀錄〉，收於許雪姬主編，《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記錄》，頁134-135。

<sup>77</sup> 不著撰人，《教育部私立大夏大學》（上海：大夏大學，1991），頁1-12，〈畢業生名錄〉，如本科第二屆有何景霖、第四屆有王慶勳、第七屆林家驥（即霧峰林家下厝林金生）。

東南醫學院等。<sup>78</sup> 大抵來說，就讀上述學校的學生，在政治光譜上較為抗日，反之選擇東亞同文書院者較不具抗日的背景，但也不能一概而論。同文書院以培養商業人才為主，注重中文的訓練，更有好的師資和設備，但最具吸引力的還是在於畢業後有良好的就業機會。陳祖恩以 1908 年 4 月的調查為例來說明，當時畢業於政治科的有 40 名，除了 3 人在日本就職外，大半在中國。任職於日本學校、外交機構、報社；畢業於商務科的有 267 名，回日本在相關商社任職的有 23 人；在中國就業的有 188 名，以任通譯最多，其次在三井、三菱駐華各商社、日本相關銀行支店等任職，除了因病輟學回鄉的 8 人，因故死亡的 10 人，在美國、朝鮮就職的 2 人外，就業率相當高，<sup>79</sup> 這對在臺灣求職困難的臺灣學生而言，自然是一所值得就讀的學校。到了滿洲國於 1932 年成立，之後陸續成立的各種分裂中國之政權，提供了不少就職機會，也大量任用出身東亞同文書院者。<sup>80</sup> 1937 年中國對日宣戰，吸引臺灣人子弟就讀的原因，乃學生家長大半已移居中國。<sup>81</sup>

就目前所知第 44 期大學部的王康緒，鹿港人，其父王永宗於 1932 年即到廈門、福州、上海、天津從事商業視察，<sup>82</sup> 1934 年到滿洲國首都新京蒙政部任職，後在北京華北政務委員會任參事，1942 年轉行從事煤炭生意，<sup>83</sup> 故王康緒到上海就讀。第 44 期專門部的林仲秋，為第 16 期的林伯奏之子，當時全家住在上海。<sup>84</sup> 第 45 期專門部的謝哲義，父為謝達淋醫師，<sup>85</sup> 早逝，其母陳杏村原為裁縫師，

<sup>78</sup> 上海東南醫學院為張錫祺所設，在該院擔任眼科教授，原名東亞醫科大學，一些臺灣人前往就讀，如廖東耀、李新海。以上資料參見葉盛吉，〈葉盛吉日記〉（未刊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1948 年 9 月 3 日；顏世鴻，〈上海·上海〉（未刊稿，作者贈與），頁 207；臺灣省醫師公會編，〈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暨臺北市醫師公會會員名冊〉（臺北：該會，不著年代），頁 204-205。

<sup>79</sup> 陳祖恩，〈上海日僑社會生活史（1868-1945）〉，頁 452-454。

<sup>80</sup> 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 344-353，其中頁 350-353，介紹各期畢業生前往滿洲者。

<sup>81</sup> 大田修吉（臺灣總督府外事部管理課長），〈海外に於ける本島同胞〉，《新建設》（臺北）3: 3（1944 年 3 月 1 日），頁 36，「海外に留本島人調」（昭和 18 年 12 月）。據大田的論文，移居上海的臺灣人不少。

<sup>82</sup> 〈臺灣總督府外國旅券下付表〉（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3,8,5-8，207.170，〈王永宗〉，臺中州，昭和 7 年（1932）12 月 23 日下付，頁 193。

<sup>83</sup> 李心怡，〈獨盟秘書長王康厚 全心全意珍愛臺灣〉，《新臺灣新聞週刊》（臺北）601（2007 年 9 月 27 日），頁 52-55。

<sup>84</sup> 〈在華中臺灣同胞ノ横顔〉，收於吳茂仁編輯《在華中臺灣同胞寫真年鑑・附商工名人錄》，頁 115-116。

<sup>85</sup> 謝達淋，臺南白河人，1926 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之後回臺南白河開醫院。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林進發，1934 年第 4 版），〈臺南州〉，頁 79。

後任上海南華實業公司常務董事，舉家居住上海。<sup>86</sup> 吳逸民為吳三連長子，吳三連戰爭後期由東京遷北京，再搬到天津租界，與連襟陳火碑合組「合豐行」，經營染料生意，而後全家搬到天津，<sup>87</sup> 吳逸民乃選擇報考同文書院大學第46期預科，唯未及就學即已閉校。此外，也有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肄業，因東京物資缺乏，乃到上海就讀第45期專門部的臺南劉家劉改造。<sup>88</sup>

2015年3月為了訪談曾就讀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預科的王康緒（王宏），我特地到上海訪問他投考該校的原因，他說明了當時的背景：

我的父親王永宗，鹿港人，1932年暑假父親帶我們全家到東北長春，我轉入西廣場小學，僅就讀一學期，再轉入八島小學，一直到畢業。由於家中兄弟多，經濟狀況不太好，父親要我投考商業學校，將來還可以繼續再讀商專，但我沒有考上，因此入青年學校（補習教育）。……我在1939年考進北京日本中學，4年畢業。當時我們父母在大陸的，因為戰爭，既去不了日本，也回不了臺灣，必須在大陸求發展。當時有三間學校可以考慮，一是興亞學院，這是專門學校，一是滿洲的建國大學，另一就是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這學校很難考，尤其1939年改大學部後。……這個學校的學費很貴，但因2/3以上是由日本府縣推薦來考試的公費生，而且有需要同文書院人才畢業後使用的，都會幫忙出學費，也因為如此，同文書院的畢業生有出路。我讀了預科1年，就順利進入本科。……<sup>89</sup>

## （二）就學的臺灣學生人數

就讀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臺灣人有多少？如果以前述武井義和論文中所做出的表1有21人，包括B（退學）、C（退學、後年再入學、病死），若除去這

---

<sup>86</sup> 陳杏村在戰前代南洋煙草公司出面向日本捐獻軍機，戰後被捕，以戰犯罪起訴，後被判無罪。參見《陳杏村（臺灣臺南）戰犯案》，全宗號：179，案卷號：1023。謝哲義當年21歲，住上海，曾呈〈為生母被訴戰犯案件具呈辯訴懇乞省釋以恤無辜事〉。

<sup>87</sup>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記，《吳三連回憶錄初稿》（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2），頁95-100。

<sup>88</sup> 劉克全，〈劉改造先生（1926-2012）略歷〉，「臺南劉家雜錄」，下載日期：2018年3月1日，網址：<http://www.laijohn.com/Laus/Lau,Kcho/biog/family.htm>。

<sup>89</sup> 許雪姬訪問、記錄，〈王宏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



兩人，則和表 2 的人數一樣都是 19 人。<sup>90</sup> 就目前所知的〈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部・專門部卒業生並に在籍者名簿〉（自第一期至第四十六期），<sup>91</sup> 並未有學生的籍貫，而漢式姓名中包括朝鮮人、中國人、臺灣人，實難以分辨。若自《同窓會名簿》〈第三編 同窓生回顧錄〉來看，也只有蛛絲馬跡，如「許斌華、大阪商大、銀行界、現在臺北で藥局。張信明、臺北で印刷業。」<sup>92</sup> 然而往後的中國、朝鮮、臺灣人名單中未見這兩人，我在〈東亞同文書院中の台湾籍学生と林如堦、吳逸民兩人戦後の白色テロ体験〉一文中就曾誤認這兩人是臺灣人。<sup>93</sup>

1987 年版的《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中已有寫明籍貫臺灣的名單，依其姓氏的日文首字排列如下：張溪祥（43 期）、陳新座（19 期）、陳濟昌（27 期）、陳弘（陳伯熙，44 專）、<sup>94</sup> 吳逸民（46 預）、<sup>95</sup> 林榮三（46 專）、<sup>96</sup> 彭盛木（23 期）、<sup>97</sup> 徐炳南（徐棣萼，24 期）、江世賢（江本賢一，46 專）、<sup>98</sup> 耿嘉賢（44 專）、<sup>99</sup> 王宏（王康緒，44 預）、<sup>100</sup> 劉改造（45 專）、林伯奏（16 期）、林聰華（24 期）、林如堦（44 預）、林大偉（44 專）、林仲秋（44 專）、林永杰（林義雄，46 專）、盧榮芳（黃榮芳，46 預）、<sup>101</sup> 謝哲義（45 專）、周文福（42 期）、<sup>102</sup> 田川文雄（46 預）、<sup>103</sup> 游本圖（44 專）、葉金朗（葉景良，24 期）、楊清輝（42 期），<sup>104</sup> 共 26 名，若加上簡崑田（35 期）、羅振麟（28 期），則有 28 名。<sup>105</sup> 到 1998 年的同窓會名簿，除姓氏〈索引〉外，還有〈出身地別名

<sup>90</sup> 武井義和，〈東亞同文書院で学んだ台湾人学生について〉，頁 34、36。

<sup>91</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頁 304-336。

<sup>92</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頁 249，〈第二十八期生回顧錄〉。

<sup>93</sup> 許雪姬著、朝田紀子譯，〈東亞同文書院中の台湾籍学生と林如堦、吳逸民兩人戦後の白色テロ体験〉，頁 122。

<sup>94</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東京：該會，1987），〈索引〉，頁 2。

<sup>95</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7），〈索引〉，頁 4。

<sup>96</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7），〈索引〉，頁 5，林榮三未能證實為臺灣人。

<sup>97</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7），〈索引〉，頁 6。

<sup>98</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7），〈索引〉，頁 8。

<sup>99</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7），〈索引〉，頁 13。

<sup>100</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7），〈索引〉，頁 20。

<sup>101</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7），〈索引〉，頁 21。

<sup>102</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7），〈索引〉，頁 23。

<sup>103</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7），〈索引〉，頁 25。

<sup>104</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7），〈索引〉，頁 31。

<sup>105</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7），頁 103。

簿〉，因此有中國、臺灣、韓國·朝鮮欄，列臺灣者有24名，其中加上陳萬增，但將徐炳南、林聰華列為福建，葉金朗列為廣東，羅振麟列為汕頭，<sup>106</sup>亦有28名。除了須排除無法確認的林榮三外，必須加上李玉田、<sup>107</sup>徐炳南、<sup>108</sup>林聰華、<sup>109</sup>葉金朗、<sup>110</sup>羅振麟，<sup>111</sup>所以初步估計有30人。參見文末之〈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學臺籍學生表〉。

除了學生外，東亞同文書院有兩名臺籍老師，一是彭阿木／彭盛木（後敘），另一位是謝華輝。<sup>112</sup>謝華輝原名謝樹欽，據《中國紳士錄》記載，其經歷為：「民國一二日本早大卒。歷充汕頭交涉署秘書、東亞同文書院講師、東亞協會常務理事兼財務處長、滿洲國專賣總署理事官、濱江專賣署長、北京特別市警察局顧問、河北省津海道指導部長、1942年擔任河北省渤海道尹。」<sup>113</sup>已故福華大

<sup>106</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7），〈索引〉，頁52。有關徐炳南、林聰華、葉金朗3人冒籍取得入學的資格，相似的情況出現在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在1937年3月20名的畢業生中，就有11名冒福建、廣東、浙江、吉林的臺灣學生。參見滿洲醫科大學編，《滿洲醫科大學一覽》（奉天：該大學，1941），頁170。而當時在福建、廣東一帶也有所謂福建籍民，即福建人入臺灣籍，假裝臺灣人，依現實需求更換國籍，這在日治時期並不少見。

<sup>107</sup> 李玉田為第29期，在《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98），〈索引〉，頁23，R行，李玉田的名後沒有出身地，同書頁42，29期中並未出現李玉田。但由大正15年（1926）8月〈臺灣總督府外國旅券下付表〉（新竹州），就有李玉田，苗栗通霄人，申請到廈門修學的旅券資料，他是臺灣人並無疑慮。參見〈臺灣總督府外國旅券下付表〉，3,8,5-8，旅100，44.771。

<sup>108</sup> 徐炳南，原名徐棟萼，於1924年5月入東亞同文書院中華學生部，1928年畢業，至少在1930年5月黃旺成到上海旅遊拜訪他時，他已在上海。參見黃旺成著、許雲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七）一九三〇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7），頁47，1930年2月6日。他們之所以認識，可能是因徐曾任臺灣民報社臺北本社記者。

<sup>109</sup> 林聰華和徐炳南同於1924年5月進入東亞同文書院中華學生部，在《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0），頁56，列入消息不明者。但在〈索引〉頁21已是「臺灣」籍。

<sup>110</sup> 葉金朗，原名葉景良，與林聰華、徐炳南是同學，在《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7），〈索引〉，頁51，已是「臺灣」籍。這三個同學中，葉、徐都有在臺地址，為臺灣人應無疑異，但武井義和論文中的表1（頁34）、表2（頁41）並未放入這3位入中華學生部就讀者。

<sup>111</sup> 羅振麟則出現在相關記載中都是廣東汕頭人，但謹慎的武井將他認定是臺灣人，應該是看到學籍簿而予判明。參見武井義和，〈東亞同文書院で学んだ台湾人学生について〉，頁34表2中的E即羅振麟，他有可能是廣東臺灣籍民。

<sup>112</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0），頁11，〈教職員 消息不明者〉。

<sup>113</sup> 中西利八編纂，金丸裕一監修、解說，《中國紳士錄》，頁518。在此傳中，謝1896年「出生」於福建南靖縣，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歷也存疑，因在《留學生の早稻田：近代日本の知の接觸領域》，頁58-61、表5〈戰前期早稻田大學臺灣人卒業生一覽〉，皆未見其名。而1957年在臺灣出版的《臺灣早稻田大學同學會會員通訊錄》亦無其名。參見《滿洲國政府公報》第110號，大同2年（1933）3月24日，頁4：「[任免辭令]大同二年三月十三日，任謝華輝為專賣公署事務官著敘薦任三等此令。派專賣公署事務官謝華輝為濱江專賣支署長此狀」。

飯店董事長廖欽福，即在其舅謝華輝任職滿洲國濱江專賣支署長時，前往滿洲參加建設哈爾濱松江堤防的護岸工程，前後 3 個月。<sup>114</sup>

### （三）由學緣而業緣

這些臺灣學生畢、肄業後，如何展開他們的人生。這是進行教育史、大學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分別在 1955、1982 年修大學史，創校 90 週年時，出版《滬城に時は流れて》回憶在學中以及記述往後的生涯，敘述名人各種各樣的人生。<sup>115</sup> 雖然本書和大學史的敘述手法不盡相同，但這其中最重要的部分，都在介紹他們在職場的光榮事蹟。相較於各期畢業生對日本學生的介紹，臺灣學生被介紹的事蹟不多，既非因為消息取得困難，<sup>116</sup> 也非中華民國政府不承認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學歷，而是篇幅有限，故僅介紹較出色的學生。

這 30 名學生中，彭盛木在戰前過世，王康緒、陳伯熙留在中國，羅振麟在香港外，都回到臺灣。畢業者有 19 人，未畢業者在中國繼續學業，如陳弘入中國上海復旦大學、王康緒就讀北京華北學院經濟系。回臺者則繼續學業或就業，如劉改造入臺大經濟系、吳逸民入臺大商學系、江世賢入臺大法律系、林永傑入臺南工學院肄業、彭桂嶺則在 1953 年赴美留學。就其往後的職業來觀察，大半從商，和他們在東亞同文書院所學息息相關，且大半從事與日本的貿易，或任駐臺北的日本商社代表，而這些商社中也不乏東亞同文書院的畢、肄業生，亦即利用日語優勢重新建立臺日間的貿易、校友間的學緣。林伯奏因在校成績優良，被上海三井洋行聘用，在戰爭後期被調去擔任軍屬，<sup>117</sup> 回臺後入華南商業銀行擔任總經理、常務董事，服務 40 年之久，後輩耿嘉賢、林大偉進入華南銀行工作，可能與他有關。1951 年他又創立新亞實業有限分司，任董事長，並在日本東京設

<sup>114</sup> 廖欽福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廖欽福回憶錄：苦盡甘嘗詠福華》（臺北：前衛出版社，2005），頁 51-58。

<sup>115</sup> 戰後日本在 1952 年與中華民國政府訂定中日和約，之前所派的先遣部隊之一是該書院 20 期畢業生中田豐千代，他擔任日本駐華大使館一等書記官，在臺灣前後 17 年；另一個 12 期的清水董三擔任駐華大使館的參事官，而後升公使。參見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 341-342。應該有機會和臺灣以及來自中國的書院生，再續學緣。

<sup>116</sup> 主要是東亞同文書院大學校友組成的滬友會，在「中」、日於 1952 年復交後，即成立臺北支部。

<sup>117</sup> 吳茂仁編輯，《在華中臺灣同胞寫真年鑑·附商工名人錄》，頁 115-116。

分公司，<sup>118</sup> 其子林仲秋，往後加入經營，成為新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sup>119</sup> 簡崑田畢業後入三井洋行會計課任職，<sup>120</sup> 一度被調為情治人員，直到戰爭結束。戰後回臺，1946年10月入省立法商學院（今中興大學）分院工作，二二八事件期間和分院主任李淇，<sup>121</sup> 代表法商學院加入處理委員會，為情治人員所舉發，<sup>122</sup> 幸得無事，往後進入前輩葉金朗所經營的臺北其昌貿易，兩人由學緣而業緣，關係更為緊密。據1982年的校史，說簡曾創立漁業會社，一度成功，而後解散，進入和三井物產合辦的會社臺灣農畜產股份有限公司，任臺中所所長，<sup>123</sup> 而後經營藥局。<sup>124</sup> 林如堦和吳逸民則沒有簡崑田幸運，前者涉入白恐案件被槍決，吳逸民則坐了11年餘的牢後出獄，入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sup>125</sup> 臺北支店，該會社有不少同文書院畢業生任職。他負責管理部門及合作事務部門的業務工作，前後17年。退休後從事國際貿易，但並不順利。<sup>126</sup> 謝哲義開設福光貿易，其學長陳萬增一度在此工作。有些從事教育工作，有兩人當過校長，陳濟昌任桃園龍潭中學首任校長、楊清輝任里港國中校長，至於游本圖、林如堦、劉改造、江世賢、盧榮芳5人教過書。也有在紡織公司任職者，如游本圖。畢、肄業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臺灣學生，在戰後有6人加入所謂「新臺灣同志會」，分別是林伯灶（包

<sup>118</sup> 張素玢等撰稿、張哲郎總編纂，《北斗鎮志》（彰化：北斗鎮公所，1997），頁759。

<sup>119</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98），頁100。

<sup>120</sup> 島津長次郎編，《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上海：金風社，1940），頁415；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585。

<sup>121</sup> 李淇，1895年生，廣東五華縣人，1924年日本京都帝大佛法科畢業。曾任東亞同文書院講師、天津中日學院教授、上海中國國際圖書館推廣部主任、上海復旦高級中學教授，1933年任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著有〈性命哲學の提倡〉、〈中國倫理觀の學的根據〉、〈日本文化の世界に於ける地位〉。參見中西利八編纂，金丸裕一監修、解說，《中國紳士錄（下）》，頁1046-1047。

<sup>122</sup> 〈件名一：張秉承轉報董貫志調查有關法商學院分院主任李淇參加暴動情形〉（民國36年3月21日）、〈件名二：董貫志呈報簡崑田、李淇參加暴動情形〉（民國36年3月15日），收於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頁210-213。

<sup>123</sup> 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303。

<sup>124</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98），頁63。

<sup>125</sup> 伊藤忠商事於1872年創立，1893年由綿絲商而成為貿易會社，1918年定名伊藤忠商事，中經1941年三興、1944年大建產業之名，戰後恢復為伊藤忠商事，是一家總合商社。進入此商社的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學生有70人。參見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311-312。伊藤忠商事也在2018年初以193億臺幣買下頂新一〇一大樓的37.2%的股權，成為一〇一單一最大股東。參見〈拿193億 頂新爽別101〉，《自由時報》，2018年2月15日，A1焦點新聞。

<sup>126</sup> 吳逸民口述、薛化元採訪，〈喚不回的青春〉，頁132-158。

括其妻、連雅堂之女林夏甸）、林仲秋、劉改造、陳伯熙、謝哲義、陳萬增。<sup>127</sup>

由上可知，同文書院的學生畢業後以在商界（包括銀行界）發展較多，教育界其次，言論界有一人、民意代表有一人，還有一位進入外交界，當然也有遭政治迫害者，顯示當局對有島外經驗的臺灣人之注意及戒心。畢、肄業於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臺灣學生，彼此間仍保持著學緣，進而建立業緣關係。《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提到該校校友的職業，包括中國研究者、外交界、言論界、實業界，<sup>128</sup> 臺灣的畢、肄業生的出身則以實業界為多。

## 五、不一樣的認同：以陳新座、彭盛木、王宏為例

「臺灣人」不論過去在清朝治下是邊陲，在日本治下是外地，在歷史情感上，日治下的臺灣人視中國為祖國、母之國，視日本為父之國，蔣渭水曾期許臺灣人做為中、日兩國間的橋樑，然而臺灣人可說夾在兩國之中，事齊、事楚難定，關鍵在於政權的不斷變化下，自身無法決定自己的歸屬和命運，因此擁有極複雜的心性，誠所謂「倚父食父、倚母食母」，因時、因地有所因應，尤其在中、日戰爭期間，臺灣人到底認同哪一個政權？是日本還是中國？而所謂中國，1940年底後中國至少有四個政權，一是在重慶號稱正統的中華民國政府，二是汪精衛在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一般稱為汪偽），三是在延安的中共政權，四是建立在中國東北的滿洲帝國（一般稱為偽滿），大體而言戰前臺灣人各有其微妙的認同。以下以陳新座、彭盛木、王宏三人為例來談。

### （一）日本駐廣東領事館副領事陳新座

陳新座（1899-1961），臺中龍井人，1915年考入臺中中學校第一屆肄業，<sup>129</sup>

<sup>127</sup> 〈新臺灣同志會入會申請書〉，「社、團、會全宗彙集」，檔號：Q130\_63\_(1)、(3)。

<sup>128</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頁108-166。

<sup>129</sup> 據武井義和論文中的表1，陳的學歷是「1919年公立臺中中學校畢業」，但依1959年8月編的《校友年鑑》，並無陳新座的名字。參見許文葵編，《臺灣省立臺中一中校友年鑑·第二號》（臺中：許叔蓀，1959），頁B1-B4。但他的同班同學謝文達之子謝東漢也說：「陳新座與筆者父親謝文達，均為臺中中學校第一期畢業，在校期間就是好朋友。」參見謝東漢、吳餘德，《徘徊在兩個祖國（下冊）》（臺北：謝東漢，2016），頁408-409，注一。另一可以證明他曾就讀臺中中學校的證據是，陳新座和陳懷澄的

1919年5月考入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第19期，是臺灣總督府的準公費生，<sup>130</sup> 當時的校舍在徐家匯虹橋路，在1921年要畢業那一年的2-3月（有時到6月）舉行實學教育，即「中國內地大旅行」，<sup>131</sup> 該屆學生151人分成20班踏遍中國各地，陳選擇最近的「上海調查班」，<sup>132</sup> 該屆除留下「調查報告書」外，也留下以〈虎穴龍領〉為篇名的「大旅行誌」。<sup>133</sup> 1922年畢業後無立刻就職的相關紀錄，1924年起任漢口日本總領事館的通譯生，1926年升為書記生，約任職到1931年。<sup>134</sup> 在漢口期間曾到該地空軍基地拜訪臺中中學校的同窗謝文達，謝擔任第六分隊長，駕駛新購入的 Corsair 轟炸機，升空為其表演特技飛行約15分鐘，可見兩人間的交情。<sup>135</sup> 在任書記生期間，1929年4月杜聰明博士受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囑託，進行「關於阿片煙膏及阿片副產物之性質並反應等之實驗的研究」而出差到朝鮮、滿洲、天津、漢口、上海等地時，曾到漢口日本總領事館拜會，他記載「又有臺灣臺中人陳新座，在該館任職」。<sup>136</sup>

1932年陳到日本外務省亞細亞局第一課任職。1933年以後任廣東總領事館的書記生，1936年升為廣東副領事，敘高等官七等，又敘從七位，賜三級俸，但收到「辭令」（聘書）當天即提出辭呈。據韓國旅日學者李昇燁的研究，陳之得以任副領事，可能是一種禮遇措施，其法律根據係1921年勅令第391號「大使館理事官、公使館理事官、副領事、貿易事務官等ノ特別任用ニ關スル件」，亦

---

長子陳培煦是臺中中學校同學，在〈陳懷澄先生日記〉中有陳新座和陳懷澄通信的紀錄。何以他不在畢業學生名單，可能是雖進入中學第4年的學程，但未讀完即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因此沒有畢業。

<sup>130</sup> 武井義和，〈東亞同文書院で学んだ台湾人学生について〉，頁34，表1，「陳」。

<sup>131</sup> 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183，第五章〈中國內地大旅行〉。

<sup>132</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頁217-219。

<sup>133</sup> 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194-195。旅行班要交「調查報告書」做為畢業論文；和「調查報告書」不同的是要交各屆集班的日記體的紀錄之大成所完成的紀行文「大旅行誌」，而調查書中的資料，日後編成《支那經濟全書》、《支那省別全誌》。報告書放在日本豐橋市愛知大學圖書館，「大旅行誌」則放在東京霞が關（虎の門）霞山ビル內的滬友會本部文庫。

<sup>134</sup> 陳新座和鹿港街長陳懷澄的長子陳培煦為臺中中學校同學（同屬第一屆），與陳懷澄間留下通信紀錄。1926年1月7日載：「……又漢口日本總領事館陳新座賀片，」；1927年9月27日：「夜照設筵請漢口歸來陳神〔新〕座氏，……」；1931年7月14日：「寄漢口緘。」；1931年8月9日：「接漢口陳緘。」到同年8月27日陳新座即由漢口到鹿港街役場探望陳懷澄。參見〈陳懷澄日記〉（未刊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sup>135</sup> 謝東漢、吳餘德，《徘徊在兩個祖國（下冊）》，頁409。

<sup>136</sup> 杜聰明，〈任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囑託及往朝鮮滿洲出張旅行〉，收於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臺北：財團法人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2012），頁245。

即經高等考試委員銓衡之後即得以升副領事，而對臺灣人並沒有限定民族的特別立法，和朝鮮人的任用有所不同。<sup>137</sup> 其辭職的原因，可能和他在東亞同文書院的身分是「準公費生」，<sup>138</sup> 總督府要任用他有關。

1938年7月陳新座進入臺灣總督府官房外事課任囑託，從事有關華南、南洋制度研究、經濟調查等工作。<sup>139</sup> 1941年3月卸任，獲得「事務格別勉勵金」85圓的獎賞。<sup>140</sup> 此後以農為業。

戰後躲過陳儀行政長官的漢奸總檢舉。<sup>141</sup> 當日、華復交，芳澤謙吉就任日本駐中華民國大使後（1952.10.6-1955.12.26），曾於1953年請陳新座到臺北，希望他擔任大使館的秘書。<sup>142</sup> 按芳澤謙吉（1874-1965），新潟縣人，犬養毅的女婿，1899年東京帝大文科英文科畢業，是日本大正、昭和時期具代表性的外交官，1923.7-1929.8年擔任駐中國特命全權公使，<sup>143</sup> 據說陳在漢口總事館任書記生之後調到南京日本公使館工作，因此陳為芳澤老部屬。<sup>144</sup>

陳回到臺中第二天，警備總司令部的一位便衣軍官就找陳談，要他提供情報給警總，警總將予以津貼。陳當場向警總人員說明，他年歲已大、健康欠佳，並不打算到大使館當秘書。幾天之後，陳新座到臺北向芳澤說明不能就任秘書職的

<sup>137</sup> 李昇燁，〈外務省の「外地人」官僚たち：朝鮮人・台湾人副領事特別任用制度を中心に〉，收於松田利彦、やまだあつし編，〈日本の朝鮮・台湾支配と植民地官僚〉（京都：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07），頁84，參看由內閣總理大臣廣田弘毅給予之「副領事陳新座依願免官」，昭和11年7月31日。

<sup>138</sup> 據武井義和的研究，東亞同文書院的學費高，如果未得到公費而是私費生，則必須繳交「所得稅納付證明書」（由市町庄役場開出）。臺灣學生除了林伯奏是板橋林熊徵資助、林大偉由某鋼鐵株式會社資助外，陳新座是唯一的準公費生，其餘全是自費。參見武井義和，〈東亞同文書院で学んだ台湾人学生について〉，頁33-37。

<sup>139</sup> 〈陳新座（解囑託、賞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冊文號：10268-143，頁955。

<sup>140</sup> 〈陳新座（解囑託、賞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文號：10268-143，頁993、996；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39），頁111；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40），頁148。

<sup>141</sup> 李永熾監修、薛化元主編、臺灣史料編纂小組編輯，〈臺灣歷史年表·終戰篇：（一）1945-1965〉（臺北：業強出版社，2001），頁10，〈政治 1946年1月15日 公佈臺灣省漢奸總檢舉相關規程〉。

<sup>142</sup> 謝東漢、吳餘德，〈徘徊在兩個祖國（下）〉，頁409，註一。但此一經歷尚須考訂。

<sup>143</sup> 〈付錄 10 主要國別對外外交官一覽 中華民國（1935.5.7 大使館に昇格）〉，收於日本近現代史辭典編纂委員會編，〈日本近現代史辭典〉，頁827-836。

<sup>144</sup> 謝東漢、吳餘德，〈徘徊在兩個祖國（下）〉，頁409，註一。

原因。<sup>145</sup> 據家屬告知，陳新座一直過著閒雲野鶴般的生活，直到 1961 年過世。

日本方面一直未能得到陳新座在臺的相關訊息，故 1955 年出版校史時，即認為他已過世。<sup>146</sup> 武井義和在論文表 2 說陳 1963 年在臺灣某大學，<sup>147</sup> 不知其資料來自何處。

日治時期臺灣人通過高等文官考試行政科、司法科者不乏其人，但少見有通過外交考試者，<sup>148</sup> 然仍有在日本外交界工作者，除了陳新座外，目前所知有嘉義朴子出身的林迺恭，曾任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的書記生。<sup>149</sup> 至於在國民政府任外交官者則有黃朝琴，歷任美國舊金山（1935）、緬甸仰光（1940）、印度加爾各達總領事。<sup>150</sup> 另有吳敦禮，臺中大甲人，在國民政府外交部任亞洲司專員、駐巴拿馬公使館秘書兼領事事務，並代理總領事館館務，後回外交部情報司供職。七七事變發生後未隨中央政府撤退到重慶，乃任「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外務局日本科科長，<sup>151</sup> 汪精衛政權於 1940 年成立後，以吳克竣之名擔任外交部參事。<sup>152</sup> 1941 年 11 月任「橫濱中華民國總領事館總領事」。<sup>153</sup> 於日本在中國占領區樹立的各種政權中，臺灣人由於語言方面的特長，故不乏任職於外交單位的例子，最顯著的即為擔任「滿洲國」第一任外交部總長、第一任駐日全權大使謝介石，<sup>154</sup> 他屬下的外交部成員有不少臺灣人。戰後這些有外交歷練者，除了黃朝琴外，一概未獲任用，即使是獲重用的黃朝琴也脫離外交界；亦有人被以「漢奸」罪名審判，如曾任滿洲國駐汪政權濟南總領事吳左金。<sup>155</sup>

由上看來，陳新座能進入日本外交界，並升任副領事，實為戰前日本外交界

<sup>145</sup> 謝東漢、吳餘德，《徘徊在兩個祖國（下）》，頁 409，註一。

<sup>146</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頁 219。他被列入畢業後三十多年來已逝世者名單。

<sup>147</sup> 武井義和，〈東亞同文書院で学んだ台湾人学生について〉，頁 40-41。

<sup>148</sup> 謝東漢、吳餘德，《徘徊在兩個祖國（下）》，頁 409，註一。

<sup>149</sup> 相關照片及照片說明為任教於彰化女中的李昭容博士所提供，她在旅遊中結識林家親戚，由林家親戚得到訊息和照片。謹致謝意。

<sup>150</sup> 秦孝儀總編纂，《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分》，頁 429，〈黃朝琴〉。

<sup>151</sup> 橋川時雄編纂，《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北京：中華法令編印館），頁 139。

<sup>152</sup> 中西利八編纂，《滿華職員錄》（東京：滿蒙資料協會，1942），頁 877。

<sup>153</sup> 不著編人，《華北政府職員錄》（出版地、出版社不詳，1943），頁 183，〈吳克竣〉。本書藏於遼寧省檔案館，僅存一半，書名被改為《偽華北政府職員錄》。

<sup>154</sup> 許雪姬，〈是勤王還是叛國：「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謝介石的一生及其認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57（2007 年 9 月），頁 57-117。

<sup>155</sup>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吳左金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臺北）5（1994 年 2 月），頁 95-120。



少數的臺灣人之一，無怪乎在其弟陳新彬醫師的傳中，也提到其兄陳新座是「元副領事」。<sup>156</sup>

## （二）具三重身分的彭盛木

彭盛木原名彭阿木，<sup>157</sup> 1902-1942，<sup>158</sup> 苗栗三義人。臺中第一中學校肄業，<sup>159</sup> 1923年考入東亞同文書院第23期，1927年畢業，在學期間以「支那語」的成績為佳，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留有其四學年所修的課及成績。<sup>160</sup> 畢業後留校任講師，<sup>161</sup> 教學對象是1920年9月起招收的中華學生部商務科一年生，所教科目有可能是日語、中日史要（此外還有倫理、英語等課）。<sup>162</sup> 1927年6月彭阿木和坂本部長帶領中華學生部三、四年生共10人，到日本參觀旅行。<sup>163</sup> 據第31期畢業生的回憶，1932年4月29日日本人在上海慶祝天長節以及戰勝，於虹口（新）公園舉行「奉祝式典」，同文書院學生乃整隊由虹橋路的校舍前往。當閱兵儀式結束後，重要貴賓、將領、日僑居留民團河端行政委員長等，齊上司令臺，進行唱「君が代」，似乎在歌聲要結束的瞬間，忽然由司令臺後的日僑區有人擲出炸彈來，在重光葵駐華特命全權公使的附近爆炸，重光公使立刻倒了下去。經調查那是投入用便當箱裝入的手製炸彈所致。<sup>164</sup> 在同文書院學生後面站立、長

<sup>156</sup>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1937），頁265，〈陳新彬〉。

<sup>157</sup> 彭阿木何時改名？在1940年3月《周佛海日記》中已稱彭盛木，推測在進入汪政權前後改名。任職財政部總務司。參見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上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頁221。

<sup>158</sup> 昭和3年（1928）7月〈臺灣總督府外國旅券下付表〉（新竹州），旅92.79，旅券種別「往復」，彭阿木出生年月日為明治35年（1902）3月25日。

<sup>159</sup> 彭阿木的名字也未出現在《臺灣省立臺中一中校友年鑑·第二號》中，料想原因是沒有畢業即前往投考東亞同文書院。

<sup>160</sup> 《東亞同文書院關係雜件／卒業者及成績關係（表紙）》，檔號：H-4-3-0-2-5。彭阿木第一學年成績如下：憲法及法學通論（68）、經濟原論（65）、商業通論（56）、簿記（60）、商業算術（62）、支那商業地理（68）、應用理學及商品學（54）、漢文（80）、支那語第一部（80）、英語第一部（74）、支那制度律令（57）、時文及尺牘（80）、支那語第二部（76）、英語第二部（69），總平均68；第二學年總平均72；第三學年總平均75；第四學年總平均76。

<sup>161</sup> 「臺灣（一）彭阿木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昭和2年度東亞同文書院卒業生就職現況〉，《東亞同文書院關係雜件／卒業者及成績關係（表紙）》。

<sup>162</sup>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編，《創立三十週年記念：東亞同文書院誌》，頁52-53。

<sup>163</sup> 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179。

<sup>164</sup> 〈日本要人昨午被炸〉，《申報》第21218期，1932年4月30日，第6版；《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555-556。尹奉吉當場被捕，經日本第四師團軍法審判，處死刑，11月18日將經神戶解送到大阪衛

得高的彭阿木助教授，自其耳朵流下血滴，這是從離 20 多公尺外的典禮臺飛來的爆彈破片造成的，<sup>165</sup> 投彈者為朝鮮人尹奉吉，當場被捕。在此次的爆炸事件中，白川義則大將受傷，在 5 月底死去外，<sup>166</sup> 野村中將失明，重光葵失去一條腿。<sup>167</sup>

除了教書外，彭阿木也從事相關研究，在支那研究部中可看見其業績，主要進行廣東一帶的客家研究，曾發表〈客家に就いての研究〉。<sup>168</sup> 據林正慧的研究，隨著日本南進政策及對華野心的昇高，使帝國特別關注在華南勢力越見膨脹的客家勢力。彭阿木是客家人，受學校委派，乃到廣東梅縣進行客家研究，因而有長達 200 多頁的研究論文出版，「是一篇有關客家的日文長篇專著，其出版早於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算是一篇重要的文章。」<sup>169</sup> 他也研究過〈上海ノ賣笑婦〉（《支那研究》第 18 號），並在 1928 年 12 月刊出其演講報告〈南方旅行所感：客家ニ就テ〉（《華語月刊》〔1928 年 6 月〕）。有上述的業績，彭阿木至少在 1930 年已升為助教授，月薪 100 円，年末慰勞金 150 円。到 1939 年，月薪已升至 135 円，擔任的科目為「支那語」。<sup>170</sup>

彭一生最大的轉折為加入中國抗日時期最重要的情治系統「軍事統計調查局」（簡稱「軍統」），擔任南京情報組副組長有關。據軍統南京情報組組長程克祥，戰後致首都（南京）高等法院函件〈關於與周佛海等發生關係及工作經過致軍統局呈（1946 年 9 月）〉，有關楊惺華（周佛海妻舅）的部分提到了彭盛木。在 1939 年 9 月間，即汪政權成立前，國府已探知汪精衛有和日本進行經濟、駐兵與組織政府的各項祕密談判，為了打入汪的集團，乃將彭盛木介紹給汪手下大

---

戍刑務所。參見〈尹奉吉等解日〉，《申報》第 21423 期，1932 年 11 月 26 日，第 13 版。

<sup>165</sup> 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 555-556。

<sup>166</sup> 〈白川義則昨午病死〉，《申報》第 21244 期，1932 年 5 月 27 日，第 3-4 版；白井勝美、高村直助、島海靖、由井正臣編，《日本近現代人名辭典》，頁 538-539，〈白川義則〉。

<sup>167</sup> 〈虹口炸彈案〉，《申報》第 21219 期，1932 年 5 月 1 日，第 2 版。

<sup>168</sup> 彭阿木，〈客家に就いての研究〉，《支那研究》（上海）22（1930 年 1 月），頁 77-183；彭阿木，〈客家に就いての研究（續）〉，《支那研究》23（1930 年 7 月），頁 113-217。本文為國史館協修林正慧所提供，謹誌謝意。

<sup>169</sup> 林正慧，《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 309。

<sup>170</sup> 近衛文麿呈三谷隆信，〈23 職員昇給ノ件，昭和十四年九月〉，《東亞同文書院關係雜件／人事關係，第二卷》，檔號：H-4-3-0-2\_1\_002。看此文件即可參照武井義和論文頁 42，彭在 1939 年 10 月以後辭東亞同文書院職的相關敘述。

將、已和軍統有聯繫的周佛海，擔任其祕書，<sup>171</sup> 方便取得情報。但彭對中國政治、社會情況不熟悉，遂由楊惺華予以協助。彭將汪、日全部會談紀錄送交軍統局。總之，凡是重要會議如基本談判、經濟會談、青島會談，甚至汪與重要日人的私人會談內容，也可由周輾轉得之。1940年汪政權成立後，周佛海任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楊惺華任財政部總務司長，乃設法讓彭盛木任財政部參事，<sup>172</sup> 因而彭得以利用此職位探得1941年8-10月汪、日間會議詳情及敵方金融、經濟上的各項措施。不料到1941年12月下旬，由楊惺華處傳出，軍統局的工作已為汪政權特工總部（位在上海極司非而路76號，簡稱76號）所偵知，1942年1月5日包括程克祥組長、彭盛木副組長及另一副組長彭壽等人全部被逮捕。<sup>173</sup> 組長、副組長三人都被羈押在76號對門之75號四層樓上，其餘被關押於76號內。1月8日、26日軍統人員陸續被槍決，三人自知不免一死，為避免被嚴刑逼供、處死，乃決意集體自殺。<sup>174</sup>

軍統人員落網，汪精衛和李士群（汪政權警政部部长）因知軍統掌握其整個秘密，案情重大，欲置軍統人員於死地。此時彭阿木之妻彭桃妹<sup>175</sup> 乃走訪在《大陸新報》工作、同為客家人、是時住在南京的吳濁流。吳濁流得知彭係被汪的情治人員逮捕，認為尚有一線生機，建議她去向曾與她同去日本的周佛海夫人求

<sup>171</sup> 《周佛海日記》第一次出現彭盛木，為3月29日：「八時起。平井偕正金上海支店經理岸波[浪]來，我方為余及覺生、盛木。」蔡德金注：「盛木，彭盛木，軍統特務。曾任上海同文書院教授，時任周佛海日語翻譯、偽財政部參事。」參見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上編）》，頁271。

<sup>172</sup>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240，〈附件：程克祥等關於與周佛海等發生關係及工作經過致軍統局呈〉。

<sup>173</sup> 當時軍統上海區長陳恭澍、南京區長錢新民均已先後被捕，至是1942年1月5日組長以下人員全部被捕。參見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上）》，頁240-241。

<sup>174</sup> 據程克祥稱，他們「決定各用墨筆（七十五號特許看書寫字）在衣服上大書“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鏟除一切漢奸”四項標語，於夜深人靜時同自四樓囚室外之涼臺躍下至極司非而路上以死。」參見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上）》，頁241。

<sup>175</sup> 彭盛木妻為李氏桃妹，1923-1926年間在新竹州北埔公學校擔任訓導。參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23-1926），頁294、300、288、303。據旅券下付表資料所載，她在1928年7-9月，申請到上海的旅券，正是彭阿木畢業的次年，時剛在東亞同文書院任教。此次和她同行的是婆婆彭謝氏梅妹。是否就此定居上海則不詳，但1932年有彭阿木夫妻帶著長男彭元相前往上海的外國旅券下付表紀錄。1938年李氏桃妹帶著長男元相、長女文菀、次男元楷及彭テワイーユーバイ，一起到上海，テワイー，1926年生，不知與彭家的關係為何。參見〈臺灣總督府外國旅券下付表〉，旅103，1928年7-9月，新竹州，李氏桃妹，上海，頁231；旅104，1932年4-6月；7-9月，新竹州，李氏桃妹，上海，頁288；旅112，1936年3月，新竹州，李氏桃妹，上海，頁603。

救。<sup>176</sup> 此舉果真奏效，76號同意彭夫人探監，彭氏夫妻用客家話交談，監視人員不知談話內容。彭夫人告訴彭盛木，周佛海夫妻、楊惺華都在盡力援救中，不但可以免死，也有恢復自由的可能。於是三人打消自殺的念頭，彭在入獄三十多天後出獄，另兩人在半年內獲釋。<sup>177</sup>

當時彭盛木具有三重身分，在重慶政府是軍統少將，在汪政權是參事，在日本這邊是東亞同文書院教授，他自認有這三種身分可以保身，是所謂的三不怕，吳濁流當面警告他要多加小心，否則有被砍頭的危險。<sup>178</sup> 彭既出獄，表面上仍在汪政權任財政部專員，負責調查統稅局之事，<sup>179</sup> 實際上仍從事軍統特務工作。

彭盛木的結局如何？《周佛海日記》中有關彭的記載只到1942年8月30日的日記，<sup>180</sup> 1982年出版的《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則說彭盛木戰後不久在上海福民醫院過世。其妻李紫荇（應是李桃妹改名）決意回臺灣，彭一家受到同期中國同學張其耿、周憲文兩人的幫忙，<sup>181</sup> 依該《大學史》的說法，彭似乎亡於1945年8-9月間，這樣記載不一定正確。據吳濁流在《臺灣連翹》一書中所載彭的結局如下：「果然這位「三不怕」彭參議，在上海舉行的（1942年）十一月三日的『明治節』慶祝會上，被日方毒殺了。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我已回到臺灣，所以詳細情形並不清楚。」<sup>182</sup> 我採用吳濁流所載，主要原因是，吳的同學鍾壬壽

<sup>176</sup> 吳濁流著、鍾肇政譯，《臺灣連翹：臺灣的歷史見證》，頁87。

<sup>177</sup>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上）》，頁241、259，〈30周揚淑慧等補陳復判理由狀（1946年12月14日）〉。

<sup>178</sup> 吳濁流著、鍾肇政譯，《臺灣連翹：臺灣的歷史見證》，頁88。

<sup>179</sup>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下編）》，頁640，8月23日，註2、頁641，8月24日。

<sup>180</sup>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下編）》，頁643，8月30日：「彭盛木來，報告昨日調查統稅局情形」。

<sup>181</sup> 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501。其中張其耿與彭阿木同為23期，周憲文則是24期（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0），頁51，將周誤為第23期）。參見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0），頁52，〈出身地別名簿〉。

<sup>182</sup> 吳濁流著、鍾肇政譯，《臺灣連翹：臺灣的歷史見證》，頁88。〔按：括弧內的年代為筆者所加。〕近日看到一則報導，是一位白色恐怖受難者陳英泰的回憶錄，他說：「白色恐怖已過去半世紀的現在，偶而會和廖運濤、曾群芳和當時臺大法學院訓導處人稱為『觀音樣』的客家籍職員的女兒彭小姐一起唱卡拉OK，彭小姐說她母親重訓就是因有百害而無一利，無論如何都不要牽涉政治事件。原來彭小姐家屬戰時在上海，父親彭先生當日本軍屬，很受日本倚重，戰爭一結束，彭先生身兼國軍工作人員身分曝露，日本舊夥伴心底不甘心，一起吃飯時被下毒後身亡。『觀音樣』心不甘，其後一再勸後輩，無論如何都不要牽涉政治事件，以免惹殺身之禍。」參見陳英泰，《回憶4：到達不了的平反之路》（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7），頁182。這個觀音樣很可能就是彭盛木之妻李氏桃妹，後改名李紫荇，而彭小姐似為彭文苑，此說詞和《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較接近。

也在汪政權下工作，<sup>183</sup> 就是《臺灣連翹》中的「章君」，人在南京，有正確消息的管道。<sup>184</sup>

戰後彭淑真為了解救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捕的丈夫饒維岳（臺中地方法院院長），向政府陳情時，說到其兄彭盛木為國犧牲的情形，可見彭盛木並非死於戰後。

……氏兄彭盛木，任職中央，為擔負特務工作，屢得氏夫種種接濟，或為鼓勵，俾完成重任，為國效勞。在抗戰期間不惜艱危，深入淪陷區，以達成使命，不幸六年前在上海敵後工作，為敵人謀害殉職。緬懷往昔，氏夫輒予忠言勉勵，大丈夫能為國家盡忠，為民族盡孝，雖死獲榮，今氏兄果中此言，死者雖死，而在天之靈亦有所知也。<sup>185</sup>

無論彭為病死、被處死，他的一生可算是東亞同文書院畢業生中特例中的特例。畢業後能留在母校教書者，幾人能夠。他受日人重用，卻未擔任日本的情報工作，表面上落水汪政權，實則為効命於國民黨的軍統特務，甚為曲折離奇。遺憾的是，對於其殉難時間尚未取得關鍵性史料。

### （三）王宏投奔新四軍、擔任上海外國語大學第一系主任

王康緒（改名王宏），1943年北京日本中學畢業後，1944年10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大學部第5期）就讀，僅在該院讀1年，即因面對日本的徵兵，而由上海返回北京家中。在親戚詹以昌<sup>186</sup>（當時改稱曾明如，原臺共）的協助

<sup>183</sup> 【宣傳部】參事 鍾任[壬]壽：「生·光緒二八廣東·學·日本早大卒·入·民國二九·住·南京太平路馬府街三畏里一號。」參見中西利八編纂，《滿華職員錄》，頁886。若再見中西利八編纂，金丸裕一監修、解說，《中國紳士錄》，頁987-988，則更清楚；時任汪記國民政府宣傳部參事、東亞聯盟中國總會宣傳委員、中國廣播協會參事。另在〈鍾壬壽傳略〉中指出，鍾生於1902年，卒於1979年，萬巒人，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師範學校，又臺灣總督府普通文官資格，曾在南京維新政府及汪政權任官，前後6年，曾主編《六堆客家鄉土誌》。參見蘇全福編著，《屏東縣鄉賢傳略》（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1997），頁280-281。

<sup>184</sup> 吳濁流著、鍾肇政譯，《臺灣連翹：臺灣的歷史見證》，頁84。

<sup>185</sup> 周琇環、歐素瑛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三）：臺灣高等法院檔案》，頁93-94。

<sup>186</sup> 詹以昌，彰化永靖人，福建集美中學畢業，1937年3月在吳拱照的介紹下加入臺灣共產黨，4月30日五一勞動節前夕為日警逮捕，被判刑7年，1941年到了北平，中共建政後在天津工作，1995年過世，曾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天津市臺盟、臺聯顧問。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秘密結社臺灣共產黨再建運動檢舉概況〉（未刊稿）（昭和7年1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賴通堯編輯，《新臺灣大眾時報》（東京）6（1931年6月27日），頁50-51。其傳則

下，投奔新四軍地區，但因故被關到抗戰勝利才又回到北京，而後就讀北京行轅主任李宗仁所辦的華北學院商學院經濟系。就學期間發生二二八事件，當時任臺灣省旅平同學會副會長，在北平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積極投入平津臺人對二二八事件的聲援。<sup>187</sup> 1947年12月加入中共地下黨，1948年12月參加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地下組織。1948年夏畢業，被安排到石家庄的華北軍政大學臺灣隊學習1年，當時臺灣隊有100多名學員，1949年9月自石家庄乘車到北京，參加「開國大典」。當時臺灣隊站在東華表前觀禮，算是視線相當好的位置。之後臺灣隊在長辛店華北軍政大學分校舉行畢業典禮。1949年12月臺灣隊乘火車到上海，他和43人被分在九兵團做解放臺灣的準備工作，不料韓戰爆發，王宏乃當志願軍戰士參加朝鮮戰爭中的第二、第五次戰役。回中國後，在上海的外貿系統工作8年，<sup>188</sup> 期間被借調到北京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做外事翻譯工作。1960年以後到上海外貿學院、上海外語學院教日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學校停課，他也「歇業」6年。1972年5月進入上海外國語大學（其早期任教的上海貿易學院併入該大學），此後開始編寫日語教材，於1974-1975年出版《上海市大學教材：日語》（日語專業用）一套3冊（俗稱上海統編教材）。這套書是「建國後國內正式出版的第二套大學日語專業用教材。」<sup>189</sup> 在教學之餘，還出版了以下書籍：《日語助詞新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日語的時和體》（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0）、《日語表達方式初探》（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1994年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以《日語常用表達方式》之名出第2版）、《日語慣用語慣例解手冊》；譯著《日語動詞“は”和“が”自學指南》、《日本展望小叢書》（共4冊），以上十本專著，總發行量在53萬冊，1980-1990年代中期，在《日語學習與研究》、《日語學習》（以上中國），《世界日語教育》、《中國語》（以

---

參見注182。

<sup>187</sup> 王宏，〈我所經歷的平津台胞對「二、二八」起義的聲援鬥爭〉，《天津台訊》（天津）160（2013年3月），頁18-21。亦刊在《上海台盟》，但期數不詳。

<sup>188</sup> 王宏先在土產出口公司任商情物價組長，後到絲綢出口公司任行情研究組長。期間被多個單位調去做日語翻譯2年，主要是在北京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擔任貿易談判和貿易協定的談判翻譯。參見王宏，〈耄耋回顧〉，收於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文化經濟學院編，《日語專業獨設系30周年暨首任系主任王宏90壽辰座談會紀要》（上海：該院，2014），頁20。

<sup>189</sup> 據王宏表示，第一套是日語專業用「聽說領先」的教材，並說明這套書的優點。參見王宏，〈耄耋回顧〉，頁20。

上日本），發表了近百篇文章，其中有 7 篇日語對應關係文章受到中、日學界重視，被稱為「日漢語語法對比研究一馬當先、產量最高的作者」。<sup>190</sup>

除了著作外，王宏也參加 1993-1994 年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和國語學會籌劃的《海外日語研究文獻目錄》編製工作，收集了中國國內著作 300 本、論文 3,000 多篇（不包括辭典和教科書），使各界了解中國的日語教育。因為在日語教學、著作上的傑出表現，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編寫的《國語年鑑》中有一欄介紹國外日語研究學者，他是 3 位被介紹的中國學者之一。

1983 年上海外國語大學成立日語系，擔任首屆系主任，直到 1986 年 2 月 60 歲卸任，共 2 年半。在任內與日本各界多所交流，並創辦日本經貿專業，於 1984 年 9 月招生。卸任後於 1987 年 10 月擔任「中國日語教學研究會」會長，在此會下進行多種多樣的活動。1994 年 69 歲離休，又返聘（續聘）了幾年才告別講壇，將所有圖書雜誌捐給上海外國語大學圖書館，又再度修訂《日語常用表達方式》（第 3 版），後又增補 5 萬多個字，2009 年改名為《日語常用表達方式辨析》出了第 4 版。又為了協助上海外國語大學新生初期經濟上的困難，就與上海外國語大學基金會簽訂「王宏愛心基金協議書」，自 2008 年開始對日語本科新生提供助學金，7 年（迄 2013）共協助 98 名學生，計人民幣 30.4 萬元。

王宏的一生大半受日本教育，在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預科就讀亦是日本教育的延續，但他卻選擇了另一種認同，戰後未和大半的家人回到臺灣，而是留在中國加入共產黨。一生為日中貿易盡力，在日語研究、教學貢獻心力，中國國務院因此給予「國務院特殊津貼」，並在 2012 年得到中國日語教學研究會所頒的「中國日語教育貢獻獎」。<sup>191</sup>

## 六、結論

本文主要探討 1900-1945 年間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臺灣學生，可做為教育史

<sup>190</sup> 王宏在這幾篇文章中，用計量分析，發現這些日語對應詞的對應率只有 1/3 到 2/3，由此找到不對應的用法及難點的所在。參見王宏，〈耄耋回顧〉，頁 22。

<sup>191</sup> 王宏，〈耄耋回顧〉，頁 18、48。

的研究、臺灣人海外活動史研究的一環。除了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外，早稻田大學也積極研究戰前該校的臺灣留學生，愛知大學做為繼承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學校，故 2013 年武井義和有了先行研究。本文雖未能看見「學籍簿」，但由大學史中亦找到臺灣人的足跡，共 30 位。研究奈良女子高等師範、早稻田的臺灣學生不是問題，但研究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對日本學者而言，有些顧忌，因其培養「中國通」恰為一刀之雙刃，雖因瞭解中國而對中國友善，但一旦戰爭發生，這些畢、肄業生就必須為日本侵華的相關工作服務，從兩位服務於三井銀行上海支店的臺籍畢業生林伯奏、簡崑田身上就可以看見。然而當時他們為日本籍，只要不站在中國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無可厚非。該書院大學是個有前瞻性的學校，臺灣學生大半在商科就讀，讀完後在求職上有其便利之處，而他們的父親有的已經移居中國，又或時勢迫使他們能選擇投考的學校有限，因此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做了有限的選擇。

經由本文的研究了解，最早前往就讀的為 1916 年的林伯奏，最晚者為 1945 年入學的大學部的吳逸民、黃榮芳和專門部的林義雄和江世賢。來自臺灣的學生大半是自費，而此自費並不表示一定是出身自富厚之家，也有他人支助，如林伯奏、林大偉；這些畢業生中比較出名的有林伯奏、在日本外交界唯一副領事陳新座，以及畢業後即留校教中國學生日語以及教日本學生「支那語」後投身軍統，最後死於上海的彭阿木／彭盛木。此外簡崑田涉入二二八事件，為情治人員所上報，幸得無事。林如堉回臺後教書，卻被捲入兩起政治案件而被判處死刑，考上、未入學的吳逸民也涉入兩案，服刑 11 年餘才得出獄。其餘的學生，除了教書、開補習班外，大半經商，從事對日貿易，而這些都利用到他們的日語能力和過去的人脈；或進入日本的商社，或自行開公司，找同窗學友一起奮鬥，看得出其中重要的學緣乃至業緣關係。留在中國未回臺灣的第 44 期生王宏和陳弘，兩人和大多數在中國的臺灣人一樣，在文革時都有一段不能說的經歷，但兩人往後在社會上發展，仍靠著「日語」，一從事教職，一從事新聞工作。陳弘在受訪時不曾提及其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過往。即使在臺灣，也有東亞同文書院畢業者的後代，到現在仍然不願意讓一般大眾知道他們父祖之輩「做過日本官」。

中華民國政府戰後承認東亞同文書院的學歷（不像滿洲建國大學的學歷不被



承認），畢、肄業生之中除了少數任公職外，大半從商，也有不幸涉入政治事件而遭處決或判刑者。在海外受高等教育的臺灣人，一旦在戰後回歸故土，往後的發展上是否受到某些限制，可以進一步探討。其次，在同文書院大學就讀的中國學生也值得研究，如戰後來到臺灣、東亞同文書院的中國籍畢業生周憲文（24期）、許斌華、張信明、<sup>192</sup> 張國周。<sup>193</sup> 又如擔任過該校教師、戰後來臺的歐陽可亮。<sup>194</sup> 日籍的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畢業生在戰後來臺灣來擔任外交人員、商社職員的也不少。<sup>195</sup> 因此圍繞在臺灣、東亞同文書院大學之間還有許多的議題可以進一步研究。

---

<sup>192</sup> 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 249。

<sup>193</sup> 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 496。

<sup>194</sup> 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7），頁 15；歐陽可亮，戰後來到臺灣，而後移居日本，1977年分別在《台灣青年》（東京）第 198、199 期發表〈戰慄の三月十三日：二・二八大虐殺の証言（一）〉（1977年 4 月），頁 9-16、〈西本願寺の地獄：二・二八大虐殺の証言（二）〉（1977年 5 月），頁 27-34。成為研究二二八事件的重要素材。

<sup>195</sup> 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頁 341-342，〈（十） 戰後、臺灣における同窓〉。

附表一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學臺籍學生表〉

期數	姓名	生平	出處	
1	16	林伯灶 (林伯奏)	1895-1992, 彰化北斗人, 連雅堂(1933年遷居上海)女婿。1916年畢業於臺北師範學校, 因成績優異, 畢業後獲板橋林熊徵資助, 進入東亞同文書院商科就讀。畢業後於1919年任職三井洋行上海支店。1934年起擔任上海臺灣同鄉會會長, 1937年七七事件爆發被徵為通譯,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被徵為軍屬。1947年舉家歸臺, 任華南商業銀行戰後第一任總經理、常務董事, 前後在華銀服務四十多年。1951年創辦新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之後設分公司於日本東京, 自任董事長。任臺灣香茅油聯營公司董事、臺灣旅行社董事等職, 設立「伯奏文教基金會」。	【1】, 頁456; 【2】, 頁42; 吳茂仁編輯, 《在華中臺灣同胞寫真年鑑·附商工人名錄》, 頁115-116; 熊鈍生主編, 《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臺北: 臺灣中華書局, 1978), 第三冊, 頁1478;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主辦工商徵信所編輯, 《自由中國工商人物誌》(臺北: 該會, 1955), 頁99; 張素玢等撰稿、張哲郎總編纂, 《北斗鎮志》, 頁759。
2	19	陳新座	1897-1961, 臺中龍井人, 1915年考入臺中中學校第一屆, 肄業。1919年考入東亞同文書院, 為臺灣總督府準公費生, 1922年畢業。1924年任日本駐漢口總領事館通譯生、1926年升為書記生、1932年在日本外務省亞細亞局第一課任職, 1933年任廣東總領事館書記生, 1936年7月31日升為廣東副領事, 同日提出辭呈。1938年7月任臺灣總督府官房外事課囑託, 從事翻譯事務, 進行有關華南、南洋制度、經濟調查等工作, 1941年3月卸任。	【2】, 頁40-42; 許叔蓀編, 《臺灣省立臺中一中校友年鑑·第二號》, 頁B1-B4; 〈龍井陳家檔案〉; 李昇輝, 〈外務省の「外地人」官僚たち: 朝鮮人・台湾人副領事特別任用制度を中心に〉, 頁84;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冊文號: 10268-143; 臺灣總督府編,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1939、1940), 頁111、148。
3	23	彭盛木	1902-1942(?), 苗栗三義人, 肄業於臺中第一中學校, 1923年考上東亞同文書院, 1927年畢業。畢業後留校擔任中華學生部商務科「支那語」的教學。之後表面上在南京汪政權擔任財政部參事兼財政部長周佛海的通譯, 實則為軍統南京情報組副組長, 安插在周身邊當情治人員。1941年年末, 為汪政權的特工總部發現遭逮捕, 經周佛海營救乃得無事。此後仍繼續從事情報工作, 遂被日本政府逮捕處刑, 約在1942年11月過世。	【1】, 頁179、501、555; 【2】, 頁42; 《東亞同文書院關係雜件/卒業者及其成績關係(表紙)》; 《東亞同文書院關係雜件/人事關係·第二卷》; 中西利八編纂, 《滿華職員錄》, 頁881;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 《周佛海日記全編》(上、下編); 南京市檔案館編, 《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上)》, 頁240-241、259。
4	24	葉金朗 (葉景良)	1908-?, 苗栗大湖人, 1914年申請到廈門的學校就讀, 1924年以中國廣東籍的身分進入東亞同文書院中華學生部, 改名葉景良, 1928年畢業。先入大阪中山太陽堂任職, 戰後在臺北市其昌貿易任職。	【1】, 頁179-180、507; 〈臺灣總督府外國旅券下付表〉, 3, 8, 5-8, 旅105, 155.876, 往復旅券, 葉金朗, 1914年3月20日, 廈門, 學校入學。

5	24	徐棣萼 (徐炳南)	1907-?, 嘉義人, 1920 年入臺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預科, 1924 年以福建籍身分, 入學東亞同文書院中華學生部, 1928 年畢業。1930 年之前任臺灣民報臺北本社記者, 之後到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上海事務所(位於上海外灘正金銀行三樓)任職。戰後曾參加臺北市議員選舉, 擔任榮臺貿易公司副經理。	【1】, 頁 180;〈臺灣總督府外國旅券下付表〉, 3,8,5-8, 旅 107, 194.473, 徐炳南, 1932 年 8 月 29 日下付, 上海、廈門, 就職;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七)一九三〇年》, 頁 47, 註 4;黃旺成,〈黃旺成日記〉(未刊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1934 年 12 月 10 日。
6	24	林聰華	1924 年以福建籍身分進入東亞同文書院中華學生部, 1928 年畢業。1940 年在上海平和運輸公司任職。	【1】, 頁 180;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滬友同窓會編,《會員名簿》(上海:該會, 1940)。
7	27	陳濟昌 (名代洋)	1907-?, 號其五, 新竹關西人。臺南商業專門學校本科畢業。1931 年東亞同文書院畢業, 據其同窗指出, 他是乒乓球達人。回臺後繼承家業, 成為東成炭礦礦主。另任竹北庄協議會員、方面委員、商業奉公團團長、竹北庄豆子埔一保保正、銓後後援會慰問部長、新竹州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取締役、廣福公司株式會社取締役、暗潭炭礦礦主。戰後 1960 年代轉入教育界, 1963 年任桃園縣楊梅中學龍潭分校主任, 該校在 1966 年獨立為龍潭中學, 任首任校長, 1971 年退休。	【2】, 頁 34;【3】, 頁 244;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 1943), 頁 220-221,〈田代洋一〉;〈楊梅中學龍潭分校 獲准升格〉,《聯合報》, 1966 年 3 月 23 日, 第 6 版、〈三所中等學校 省派新人繼任〉, 1971 年 7 月 25 日, 第 2 版。
8	28	羅振麟	1909-?, 原鄉在廣東汕頭。1928 年臺北商業學校第 8 屆畢業後, 同年考入東亞同文書院, 1932 年畢業。1934 年 5 月任滿洲國財政部屬官, 在財政部稅務司辦事, 7 月任技士, 仍在同處工作。1935 年 5 月調任稅關鑑查官佐, 在大連稅關辦事。1938 年任稅關技士兼屬官, 在同機關辦事, 1939 年 8 月辭職。1940 年到臺灣總督府投資的福大公司任職, 1942 年就職於香港日本憲兵隊。1963 年入日鐵鑛業香港事務所工作, 1976 年入八木通商株式會社香港支店辦事, 1980 年移民美國, 並以夏威夷為據點從事貿易業。	【1】, 頁 531;【2】, 頁 34;《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78 號, 1934 年 6 月 6 日, 頁 31;第 173 號, 1934 年 9 月 27 日, 頁 269;第 358 號, 1935 年 5 月 23 日, 頁 211-212;第 1392 號, 1938 年 11 月 26 日, 頁 408;第 1613 號, 1939 年 8 月 30 日, 頁 695。
9	29	李玉田	1909-?, 苗栗通霄人, 1929 年考入東亞同文書院, 1933 年畢業。戰後分別於 1951、1955 年當選苗栗縣第一、三屆縣議員;在實業方面, 於 1951 年任苗栗帽蓆產銷合作社聯合社理事, 1952 年任苗栗縣合作社聯合社理事。	【1】, 頁 537;【4】, 頁 69;〈臺灣總督府外國旅券下付表〉, 3,8,5-8, 旅 100, 44.771, 1926 年 8 月 12 日下付, 李玉田, 廈門, 修學;〈各地簡訊〉,《聯合報》, 1951 年 11 月 16 日, 第 5 版、〈昨成立聯合社〉, 1952 年 3 月 17 日, 第 5 版;何來美編纂,《重修苗栗縣志·卷十:自治志》(苗栗:苗栗縣政府, 2005), 頁 296。

10	35	簡崑田	雲林斗六人，日本東京明治學院中學部畢業後，於1935年考入東亞同文書院，1939年畢業。之後入三井物產上海支店會計課任職，直到二次大戰結束。戰後回臺，1946年10月入法商學院分院工作，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與該分院主任李淇做學校代表，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據情治人員董貫志於3月15日向臺灣站報告兩人「煽動學生暴動，搶奪倉庫。3月8日午後，由他處運來軍刀數十把，藏於該院主任室，當夜企圖暴動，乃國軍趕到，遂無法實施陰謀。」幸而事後未進一步追究。1953年經營其昌貿易，1965年任其昌貿易、漁業會社的重役（董事），1976-1983年在臺灣畜產股份有限公司任職，1985年開設國泰藥局。曾任滬友會臺北支部幹事。	【1】，頁585；【2】，頁34；【5】，頁11；【6】，頁63；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頁210-213。
11	42 (學部)	彭桂嶺	1941年4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預科，之後休學。1951年在屏東市菸酒公賣局服務，1953年赴美留學。回臺後，1963年起任職兼松株式會社臺北支店，服務長達30年。	【1】，頁625；【2】，頁41。
12	42 (學部)	楊清輝	屏東人，高雄中學（五年制）畢業後，1941年4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預科，肄業至1942年。回臺後在屏東縣里港國校任教，後任里港中學校長、高雄縣立旗山中學代校長、南山人壽保險公司經理，1985年起開設必勝補習班，任班主任。	【1】，頁625；【2】頁34、41；〈楊清輝〉，「臺灣當代人物誌資料庫」，下載日期：2018年3月1日，網址： <a href="http://drs1.ksml.edu.tw:8088/whoscapp/start.htm">http://drs1.ksml.edu.tw:8088/whoscapp/start.htm</a> 。
13	42 (學部)	周文福 (日名安田浩康)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畢業，1941年4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預科，肄業至1943年。1953年入中央信託局工作，1963年在中央信託局駐東京辦事處任職，活躍於日臺貿易界18年。退休後在東京丸榮企業株式會社、キスリン有限公司服務。而後將自宅開發成高級民宿，供來日臺灣人和外國人住宿。	【1】，頁625；【2】，頁34、41。
14	43 (學部)	張溪祥 (日名長本邦雄)	1941年臺中第二中學校畢業，1942年7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1945年9月20日畢業。1963年任職於日本勸業銀行，1976年任該行臺北支店次長，1985年在日本NEC（恩益禧）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任副總經理。	【1】，頁635；【2】，頁34、41；〈勸銀女籃 昨天返日〉，《經濟日報》，1971年10月29日，第6版；〈恩益禧研討光學字符閱讀機〉，1986年8月13日，第9版。
15	44 (學部)	陳弘 (原名)	1924年生，臺北人，戰後改名陳弘。基隆中學肄業期間因1941年「基隆中學FMAM」事件被處以無限期停學。為繼續升學，1942年到東京讀書，而後於1944年1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預科，10月進入學部，未及	【1】，頁638；【2】頁34、41；陳弘，〈半世紀的死別與重聚〉，頁97、101、103；〈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公告致戍徵署放（一）字第40544號〉，《臺灣新生報》，1946年11月8日，第6

	陳伯熙	<p>畢業而日本已戰敗。戰後回臺，1946年考取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主辦單位的「升學內地專科以上學校公費生」，進入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先擔任助教，之後的經歷不詳。1976年中共改革開放後，在《人民日報》擔任翻譯，而後在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國際聯絡部日本關係部門《人民日報》國際部任編輯。1980年任《人民日報》駐東京記者，1982年調中央編譯局主持編譯《鄧小平文選》，半年後完成，立刻和日本東方書店聯合出版。由於翻譯非常傑出，被評選為第一批全中國資深翻譯家，1990年退休，轉任全國臺灣聯誼會理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p>	版。
16	44 (学部) 王宏 (原名王康緒)	<p>1925年生，鹿港人，戰後改名王宏。1943年北京日本中學畢業後，1944年1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預科，10月進入學部。由於日本要徵兵，故由上海逃回北京的家，在親戚協助下投奔新四軍地區，因故被關到抗戰勝利才出獄，之後就讀華北學院商學院經濟系。1947年12月加入共產黨，1948年12月參加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地下組織，畢業後，到河北石家庄的華北軍政大學學習，1949年10月1日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之後在長辛店舉行畢業典禮，12月搭火車到上海參加解放臺灣的工作，不料韓戰爆發，乃加入志願軍戰士，參加第二、五次朝鮮戰爭。戰爭結束後進入外貿系統工作8年。1960年到上海外貿學院、上海外語學院教日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歇業」6年。1972年在上海外國語大學任教，一面編寫教材，一面進行研究。1983年上海外國語大學成立日文系，擔任首屆系主任，1986年卸任，1994年離休再返聘。由於對日語教學的貢獻，2012年得到中國日語教學研究會所頒的「中國日語教育貢獻獎」。</p>	【1】，頁641；【2】，頁34、41；王宏，〈耄耋回顧〉，頁18-49。
17	44 (学部) 林如堉	<p>臺北板橋人，1944年1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預科，10月進入學部。戰後回臺，先後在板橋中學、泰北中學教書。1948年10月21日突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逮捕，理由是被李薰山（1947年在臺大任助教）吸收加入共產黨，他又和李等人吸收劉招枝加入，但因當時尚未戒嚴（1949年5月），故被判處3年6個月徒刑、褫奪公權3年。不料在獄1年1個月又4天，再度涉入「吳朝麒等匪諜案」，亦即其在獄中組織「工作同志會」，吸收李梓鼎等，被法官認定吳、林兩人判刑在</p>	【3】，頁332；〈林如堉個人資料〉，案號：49090；〈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在板橋中學、泰北中學教書。1948年10月21日突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逮捕，理由是被李薰山（1947年在臺大任助教）吸收加入共產黨，他又和李等人吸收劉招枝加入，但因當時尚未戒嚴（1949年5月），故被判處3年6個月徒刑、褫奪公權3年。不料在獄1年1個月又4天，再度涉入「吳朝麒等匪諜案」，亦即其在獄中組織「工作同志會」，吸收李梓鼎等，被法官認定吳、林兩人判刑在

			監，卻仍繼續宣傳匪黨理論，吸收他人參加共產黨，以非法之方法意圖顛覆政府，已達「著手之程度殊為顯著」，乃判處死刑。1950年12月16日被處決於馬場町，得年27歲。	
18	44 (專門部)	陳萬增	1942年高雄中學畢業，1943年4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專門部(第一期)，1945年9月20日因戰爭結束而提早畢業。1951年進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3年任職於學弟謝哲義的家族企業福光貿易株式會社，1963年轉任日資東洋綿花株式會社臺北支店，1976年擔任極東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1985年入東信交易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副總經理。	【1】，頁649；【2】，頁41；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同窓會編，《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第十八回關係者名簿》(東京：該會，1983)，頁85。
19	44 (專門部)	耿嘉賢	1942年臺北第二中學畢業，1943年4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專門部(第一期)，1945年9月20日因戰爭而提早畢業。曾任華南銀行松山分行經理。	【1】，頁649。
20	44 (專門部)	林大偉	1943年畢業於臺中第一中學校，1943年4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專門部(第一期)，1945年9月20日因戰爭而提早畢業，其學費由某鋼鐵株式會社提供。1951年進入華南銀行鳳山分行，1953年轉任高雄分行，1963年轉任岡山分行，1976年任總行副主任，1985年任臺北中崙分行經理，再任士林分行經理。	【1】，頁649；【2】，頁34；許叔蓀編，《臺灣省立臺中一中校友年鑑：第二號》，B97。
21	44 (專門部)	林仲秋	林伯奏(16期)子。1941年上海居留民團立日本商學學校畢業，1943年4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專門部(第一期)，1945年9月20日因戰爭提前畢業。戰後，和父親林伯奏與校友加入成立於上海的「新臺灣同志會」。1953年起任職於李仲義商店臺北支店，1963-1973年在自家企業新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駐日(東京)代理店任職，1978年入掌總理課，1985年升任總經理，而後擔任董事長。	【1】，頁649；【2】，頁34；【6】，頁100；〈新臺灣同志會入會申請書〉；〈亞洲公司與日商合作 將製鑄鋼與鑄鐵造模機〉，《經濟日報》，1974年4月6日，第5版。
22	44 (專門部)	游本圖	1942年基隆中學畢業，1943年4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專門部(第一期)，1945年9月20日因戰爭提早畢業。1953-1963年在蘭陽女中任職，之後任職於泰和音響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工廠，1985年任職於桃園隆德紡織公司。	【1】，頁649；【2】，頁34、41。
23	45 (專)	劉改造	1926-2012，臺南人，祖父劉瑞山是臺南一帶的旺族，父親劉青雲，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理財科畢業，母親本目貞子，日本青山女學校	【1】，頁658；【2】，頁34、41；〈新臺灣同志會入會申請書〉；劉克全編著，《永遠的劉瑞山》(臺南：劉克全，

	門部 )	英文科畢業，為長男。臺南第一中學畢業後，於 1943 年就讀日本早稻田大學，但因戰爭末期東京物資缺乏，生活困難，1944 年 9 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專門部（第二期）。入學後奉命往南京當學生軍。日本戰敗後，於上海加入「新臺灣同志會」。回臺後，考入臺灣大學法商學院經濟系，畢業後在臺南高商教會計學，並經營家業。	2004），頁 115-154，〈劉改造先生（1926-2012）略歷〉。
24	45 （專門部）  謝哲義	臺南人，父謝達淋醫生早逝，母陳杏村畢業於日本洋裁學校，為裁縫師。後到上海南華實業公司任常務董事，遂舉家遷往上海。1944 年東京某學園中學校畢業後，同年 9 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專門部（第二期）。戰後先加入新臺灣同志會，由於母親涉及戰犯案，入上海監獄，曾呈〈為生母被訴戰犯案件具呈辯訴懇乞省釋以恤無辜事〉救母，後母被判無罪。戰後舉家回臺，而後其母經營臺日香蕉貿易，頗為有成，後全家移居日本（而後歸化日籍），1963 年開設福光貿易株式會社。	【2】，頁 34；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臺南州〉，頁 79；〈新臺灣同志會入會申請書〉；《陳杏村（臺灣臺南）戰犯案》；林滿紅，〈政權移轉與菁英絕續：臺日貿易中的政商關係（1950-1961）〉，收於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編，《「帝國夾縫中的臺灣」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頁 377，〈表四 臺灣蕉商的在日聯合〉。
25	45 （專門部）  陳宗銘	舊姓竹內。1944 年 9 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專門部（第二期）。戰後在臺灣水泥分司桃園區任職。	【5】，頁 120。
26	46 （預科）  吳逸民	1929-2014，臺南人，吳三連長子，成長於東京，在馬込小學校畢業，之後就讀芝中學（增上寺附設中學）四年級（1944）時全家遷到中國天津定居，12 月轉讀日本天津中學，1945 年 3 月畢業，4 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部預科，此時該大學因戰爭而轉到日本富山市的吳羽分校繼續授課，故未前往就讀。戰後於 1946 年回臺，進入臺北建國中學高中部就讀，1948 年考入臺灣大學商學系，1952 年 2 月 23 日被警總保安司令部逮捕，這時距其父吳三連上任臺北市長不到 4 個月。被捕的原因主要是加入「民主自治同盟」，並與案頭吳哲雄（臺大政治系）等人研討唯物辯證法，且思想偏激不滿現實，攻擊政府。1952 年 8 月 18 日判決，處有期徒刑 10 年、褫奪公權 10 年。服刑中又因加入馬時彥「新聯會」組織一案遭牽連，被判感化 3 年，經其父營救，感訓時間縮短為 1 年 10 個月又 9 天，1963 年 12 月 31 日出獄。1964 年起在伊藤忠商業株式會社臺北支店負責管理部門及合作事務部門的業務工作，前後 17 年。退休後從事國際貿易。	【1】，頁 662；〈馬君等叛亂一案判決〉（臺北：國家檔案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6/3132422/422/1100，頁 1-36；〈謹將馬君等叛亂案內林君等以次各犯更審及覆判情形〉，B3750347701/0046/3132422/422/1/003；吳逸民口述、薛化元採訪，〈喚不回的青春〉，頁 132-158。

27	46 (預科)	田川文雄	1945年4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預科。	【3】，頁333；【6】，〈索引〉，頁52。
28	46 (預科)	盧榮芳 (原姓黃)	1945年4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預科，回臺後任教於臺北市龍安國民學校。	【1】，頁662；【4】，頁148。
29	46 (專門部)	江世賢 (日名江本賢一)	彰化員林人，上海商業學校畢業後，1945年4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專門部(第三期)。回臺後考入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先在員林中學擔任國文老師，之後轉到實業界，先後任職廣成產業股份有限公司(飼料工廠)企劃部專員、艷波電業有限公司。	【1】，頁664；【5】，頁182。
30	46 (專門部)	林永傑 (原名林義雄)	臺南人，1927年生，1945年4月考入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專門部(第三期)。戰後考入省立臺南工學院(今成大)先修班，之後進入建築系，肄業。歷任美國新聞處臺南圖書館館長私人助理、臺南市民航空運分公司供應處高級辦事員、亞洲航空公司臺北總公司採購組組長、臺北市美國通用電子公司臺灣公司採購處副經理、臺北市欣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股東代表兼總經理。長於柔道，歷任中華民國柔道協會常務理事兼國際事務組組長、臺北西區國際獅子會監事兼體育委員會召集人、亞洲柔道聯盟技術諮問委員、世界柔道聯盟國際柔道裁判，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顧問。曾獲頒金色體育獎章，在三屆奧運會(西德、加拿大、蘇聯)擔任裁判，獲得最佳國際裁判獎狀。	【1】，頁665；〈林永杰〉，「臺灣當代人物誌資料庫」，下載日期：2018年3月1日。

## 參考資料：

- 【1】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82)。  
【2】武井義和，〈東亞同文書院で学んだ台湾人学生について〉，頁34，表1；頁41，表2。  
【3】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1955)。  
【4】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0)。  
【5】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87)。  
【6】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1998)。



## 引用書目

《申報》

《自由時報》

《新臺灣大眾時報》

《經濟日報》

《滿洲國政府公報》

《臺灣新生報》

《聯合報》

〈林如增個人資料〉（國家檔案局受難者個人資料），案號：49090。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臺灣總督府外國旅券下付表〉（1897-1942年）。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東亞同文書院關係》，檔號：I-1-5-0-11。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東亞同文書院關係雜件》，檔號：H-4-3-0-2\_1\_002、H-4-3-0-2-3、H-4-3-0-2-5。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東亞學校關係雜件》，檔號：H-4-3-0-8。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陳杏村（臺灣臺南）戰犯案》，全宗號：179，案卷號：1023。南京：中國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文號：10268-143。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社、團、會全宗彙集」，檔號：Q130\_63\_(1)、Q130\_63\_(3)。上海：上海市檔案館藏。

許雪姬訪問、記錄，〈王宏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2015年3月7日，於中國上海安亭別墅花園酒店。

陳懷澄，〈陳懷澄日記〉（未刊稿），1926-1927年、1931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黃旺成，〈黃旺成日記〉（未刊稿），1934年12月10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葉盛吉，〈葉盛吉日記〉（未刊稿），1948年9月3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祕密結社臺灣共產黨再建運動檢舉概況〉（未刊稿）（昭和7年1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顏世鴻，〈上海·上海〉（未刊稿，作者贈與）。

「臺灣當代人物誌資料庫」，下載日期：2018年3月1日，網址：<http://drs1.ksmil.edu.tw:8088/whoscapp/start.htm>。

劉克全，〈劉改造先生（1926-2012）略歷〉，「臺南劉家雜錄」，下載日期：2018年3月1日，網址：<http://www.laijohn.com/Laus/Lau,Kcho/biog/family.htm>。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編）

1930 《創立三十週年紀念：東亞同文書院誌》。上海：上海東亞同文書院。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滬友同窓會（編）

1940 《會員名簿》。上海：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滬友同窓會。

大田修吉

1944 〈海外に於ける本島同胞〉，《新建設》（臺北）3(3): 36。

大學史編纂委員會（編集）

1982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創立八十周年紀念誌》。東京：滬友會。

不著撰人

1943 《華北政府職員錄》。出版地、出版社不詳。

1991 《教育部私立大夏大學》。上海：大夏大學。

中西利八(編纂)

1942 《滿華職員錄》。東京：滿蒙資料協會。

中西利八(編纂)，金丸裕一(監修、解說)

2007 《中國紳士錄》。東京：ゆまに書房。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主辦工商徵信所(編輯)

1955 《自由中國工商人物誌》。臺北：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日本近現代史辭典編集委員會(編)

1978 《日本近現代史辭典》。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王宏

2013 〈我所經歷的平津台胞對「二、二八」起義的聲援鬥爭〉，《天津台訊》(天津)160: 18-21。

2014 〈耄耋回顧〉，收於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文化經濟學院編，《日語專業獨設系30周年暨首任系主任王宏90壽辰座談會紀要》。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文化經濟學院。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1986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Ⅲ)》。東京：綠蔭書房，復刻版。

臼井勝美、高村直助、鳥海靖、由井正臣(編)

2001 《日本近現代人名辭典》。東京：吉川弘文館。

何來美(編纂)

2005 《重修苗栗縣志·卷十：自治志》。苗栗：苗栗縣政府。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記)

1992 《吳三連回憶錄初稿》。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吳茂仁(編輯)

1943 《在華中臺灣同胞寫真年鑑·附商工名人錄》。上海：吳茂仁。

吳逸民(口述)、薛化元(採訪)

2015 〈喚不回的青春〉，收於周佩蓉等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輯三：喚不回的青春》，頁131-158。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濁流(著)、鍾肇政(譯)

1988 《臺灣連翹：臺灣的歷史見證》。臺北：前衛出版社。

李心怡

2007 〈獨盟祕書長王康厚 全心全意珍愛臺灣〉，《新臺灣新聞週刊》(臺北)601: 52-55。

李永熾(監修)、薛化元(主編)、臺灣史料編纂小組(編輯)

2001 《臺灣歷史年表·終戰篇：(一)1945-1965》。臺北：業強出版社。

李昇燁

2007 〈外務省の「外地人」官僚たち：朝鮮人・台灣人副領事特別任用制度を中心に〉，收於松田利彦、やまだあつし編，《日本の朝鮮・台湾支配と植民地官僚》，頁75-86。京都：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杜淑純(編)

2012 《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臺北：財團法人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

2003 《周佛海日記全編(上、下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周琇環、歐素瑛（編）

2002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三）：臺灣高等法院檔案》。臺北：國史館。

奈良女子大学アジア・ジェンダー文化学研究センター（編）

2014 《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学校とアジアの留学生》。奈良：奈良女子大学アジア・ジェンダー文化学研究センター。

林正慧

2015 《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林進發（編著）

1934 《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林進發，第4版。

林滿紅

2005 〈政權移轉與菁英絕續：臺日貿易中的政商關係（1950-1961）〉，收於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編，《「帝國夾縫中的臺灣」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349-380。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武井義和

2013 〈東亞同文書院で学んだ台湾人学生について〉，收於馬場毅、許雪姬、謝國興、黃英哲編，《近代台湾の經濟社会の変遷：日本とのかかわりをめぐって》，頁31-48。東京：東方書店。

南京市檔案館（編）

1992 《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紀旭峰

2015 〈戦前期早稲田大学のアジア人留学生の軌跡：中国人と台湾人留学生数の動向を中心に〉，收於李成市、劉傑編著，《留学生の早稲田：近代日本の知の接触領域》，頁34-65。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島津長次郎（編）

1940 《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録》。上海：金風杜。

浜口裕子

2015 《満洲国留日学生の日中関係史：満洲事变・日中戦争から戦後民間外交へ》。東京：勁草書房。

秦孝儀（總編纂）

1985 《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馬場毅

2013 〈東京同文書院について〉，收於馬場毅、許雪姬、謝國興、黃英哲編，《近代台湾の經濟社会の変遷：日本とのかかわりをめぐって》，頁3-29。東京：東方書店。

馬場毅

2017 〈序説〉，收於馬場毅編集，《近代日中関係史の中のアジア主義：東亞同文会・東亞同文書院を中心に》，頁8-9。名古屋：あるむ。

高 興

2012 《中國現代文人與上海文化場域（1927-1933）》。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高雄州立高雄中学校同窓会（編）

1983 《高雄州立高雄中学校第十八回関係者名簿》。東京：高雄州立高雄中学校同窓会。

張素玢等（撰稿）、張哲郎（總編纂）

1997 《北斗鎮志》。彰化：北斗鎮公所。

許文葵（編）

1959 《臺灣省立臺中一中校友年鑑・第二號》。臺中：許叔蓀。

許雪姬

2003 〈滿洲經驗與白色恐怖：「滿洲建大等案」的實與虛〉，收於許雪姬主編，《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記錄》，頁1-39。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2007 〈是勤王還是叛國：「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謝介石的一生及其認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57: 57-117。

2012 〈在「滿洲國」的臺灣人高等官：以大同學院的畢業生為例〉，《臺灣史研究》（臺北）19(3): 95-149。

許雪姬（主編）

2015 《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

1994 〈吳左金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臺北）5: 95-120。

1995 《藍敏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雪姬（訪問）、黃美滋（紀錄）

2003 〈百年憶往：莊四川先生訪談紀錄〉，收於許雪姬主編，《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記錄》，頁131-230。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許雪姬（著）、杉本史子（譯）

2012 〈日本統治における台湾人の中国での活動：満洲国と汪精衛政権にいたる人々を例として〉，《中国21》（東京）36: 97-122。

許雪姬（著）、朝田紀子（譯）

2017 〈東亜同文書院中の台湾籍学生と林如堉、吳逸民兩人戦後の白色テロ体験〉，收於馬場毅編集，《近代日中関係史の中のアジア主義：東亜同文会・東亜同文書院を中心に》，頁113-132。名古屋：あるむ。

陳 弘

2014 〈半世紀的の死別與重聚〉，收於鐘明宏，《一九四六・被遺忘的臺籍青年》，頁95-110。臺北：沐風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陳英泰

2017 《回憶4：到達不了的平反之路》。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陳祖恩

2009 《上海日僑社會生活史（1868-1945）》。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彭阿木

1930 〈客家に就いての研究〉，《支那研究》（上海）22: 77-183。

1930 〈客家に就いての研究（續）〉，《支那研究》（上海）23: 113-217。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

2017 《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七）一九三〇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黃福慶

1976 〈東亞同文會：日本在華文教活動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5：337-368。  
愛知大學東亞同文書院大學記念センター（編集）

2014 《愛知大學創成期の群像：寫真集》。名古屋：愛知大學東亞同文書院大學記念センター。  
廖欽福（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

2005 《廖欽福回憶錄：苦盡甘嘗詠福華》。臺北：前衛出版社。

滬友會

1955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東京：滬友會。

1980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東京：滬友會。

1987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東京：滬友會。

1998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同窓會名簿》。東京：滬友會。

滿洲醫科大學（編）

1941 《滿洲醫科大學一覽》。奉天：滿洲醫科大學。

熊鈍生（主編）

1978 《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第三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臺灣省醫師公會（編）

不著年代 《臺灣省醫師公會所屬各縣市暨臺北市醫師公會會員名冊》。臺北：臺灣省醫師公會。

臺灣新民報社（編）

1937 《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臺灣總督府（編）

1939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

1940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

劉傑

2000 《漢奸裁判：対日協力者を襲った運命》。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劉克全（編著）

2004 《永遠的劉瑞山》。臺南：劉克全。

歐陽可亮

1977 〈戰慄の三月十三日：二・二八大虐殺の証言(一)〉，《台灣青年》（東京）198：9-16。

1977 〈西本願寺的地獄：二・二八大虐殺の証言(二)〉，《台灣青年》（東京）199：27-34。

橋川時雄（編纂）

1940 《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北京：中華法令編印館。

興南新聞社（編）

1943 《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

戴國輝

1985 《台湾と台湾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求めて》。東京：研文出版。

謝東漢、吳餘德

2016 《徘徊在兩個祖國（下冊）》。臺北：謝東漢。

蘇全福（編著）

1997 《屏東縣鄉賢傳略》。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 **Taiwanese Students of Tōa Dōbun Gakuin University, 1900-1945**

Hsueh-chi Hsu

### **ABSTRACT**

The Tōa Dōbun Gakuin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Nanjing in 1900 by the Japan Tōa Dōbunkai for training China experts, and was moved to Shanghai in the same year. It was funded largely by government grants, and was closed in September 1945, one month after the surrender of Japan. During the 45 years of its existence, it had educated 4,368 students, trained many experts in academic, diplomatic, media, and business fields. However, from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they were just vanguards of invasion. Among them, there were 30 students from Taiwan; three of them enrolled in the Chinese division of the University in 1920 using forged identities as natives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Despite some research done,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more in-depth exploration.

With reference to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University from Diplomatic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passport lists, histories of universities, and records of alumni associations, this paper first describes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then explores why Taiwanese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University, and traces their study experiences and careers after graduation.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is given to three students, namely Chen Hsin-tso from Taichung who later served in Guangdong as vice consul of Japan, Peng Sheng-mu from Miaoli who became the deputy division head of the Nanjing Office of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and Wang Hong from Lukang who became a professor of Japanese literature at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Though all from the same University, they developed distinct career paths. This research on Taiwanese students of the Tōa Dōbun Gakuin University complements earlier study on Taiwanese graduates from the Waseda University and Nara Women's Normal University, provid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picture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of Taiwanese studying overseas.

**Keywords:** Tōa Dōbun Gakuin University, Chen Hsin-tso, Peng Sheng-mu, Wang Hong